



{ 闽 都 文 化 掠 影 }

{ 古 田 会 馆 }

唐 希 文 / 图

历史上古田县系福州府辖区十邑之一，为闽江进入福州流域第一站，是地灵人杰的鱼米之乡，历来以稻米、酒糟、茶叶、木炭为主物产。古田会馆坐落在台江商贸繁华地段，其东西南北分别是上下杭、洪武道、三捷桥、白马桥。

清末民初，有米商陈必光牵头集资并捐地兴建会馆，谷黄米帮、红糴帮、茶帮、焯（薪炭）帮和都县米帮等五大商帮集资近两万两白银，历时约十五年，1915年建成馆舍并完成内外装饰。入会馆红砖石框门，依次为戏台、天井、钟鼓楼、酒廊、拜亭和正厅。厅内主祀妈祖女神。正厅和拜亭顶部精雕细琢之藻井、各种鎏金木雕构件斗拱、卷棚、雀替、浮雕花板之大漆细作等最为精致。会馆内装饰费用是总造价的一半，髹漆与贴金的费用是总造价八分之一。建馆收支情况由主持建馆的魏明然撰文镌刻在青石碑，分三段嵌在厅墙上。从中也能读到当年商帮和同乡会的史料。

修缮之前它曾作为福州废品回收公司仓库和民房。1996年确定为省级文保单位，遂于2007年着手按原样修复，2009年辟为“台江商贸历史文化展”场馆。从小亲历台江往事的老画家吴丹波用漆画创作了十几米长卷，描绘沿江风情，力显上世纪50年代闽江帆影和商埠码头胜景，与之相对应的江北沿岸主要建筑也在画中得以体现，漆画长卷成为展示之亮点。

如今古田会馆作为“建设廉政文化示范点”展示，活化利用于家风家训、廉政建设的宣传，人们在徘徊赞叹传统会馆的建筑装饰同时，感受包含福州传统商帮诚信文化在内的闽都文化。

目 录

往事追忆

- 4 一组黄檗老照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第一个访华团背后故事 / 郑松波
- 6 漫谈生产队到福州挑肥那些事 / 林展飞

南公河口

- 11 林森倡建忠烈祠 / 石丽钦
- 14 琉球进贡口岸为何迁移福州 / 孟丰敏
- 17 福州南公园与著名历史人物 / 徐心希

文苑艺林

- 26 石器时代、闽族、闽越族在闽都地区遗址述略 / 黄荣春
- 36 天工再续：沈绍安漆艺 / 林丽钦
- 39 考辨福州方言之古汉语“化石”（六） / 施文铃
- 43 闽台城隍信仰的变迁及其现代转型思考 / 杨济亮

十邑纵横

- 48 百年风雨五里亭 / 缪淑秀
- 52 福清北区骑岭亭古驿道漫忆 / 陈金辉

人物春秋

- 54 鸦片战争时期闽籍诗人张际亮 / 邹自振
- 57 残雪初融冻不流——仓山书画人轶事 / 蔡 林
- 61 槟城辜氏兄弟的福州行迹 / 孙源智

封面：榕树下 林振寿 /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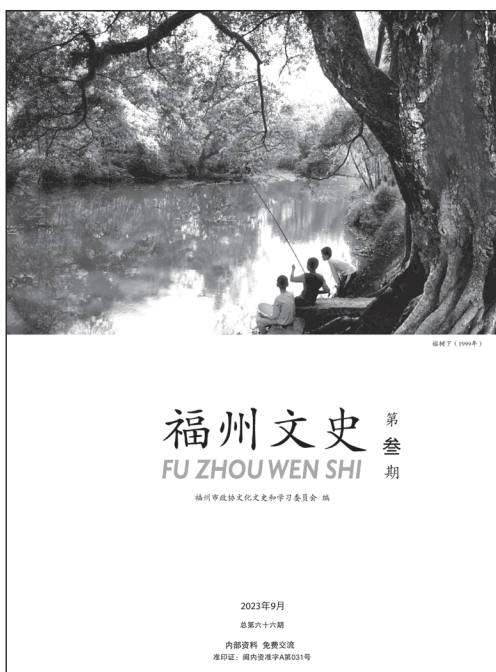
彩插：福州历史名人纪念祠 林振寿 文 / 图

封底：张斌篆刻

福州文史

2023年 第三期

(总第六十六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管: 政协福州市委员会
编印单位: 福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福州文史》编委会

主任: 林澄
副主任: 周应忠
委员: 陈高英 杨凡 卢玲
李大林 陈泽山 张振玉
李仲才 唐希

编辑部

主编: 陈高英
副主编: 卢玲 李大林
编辑: 陈泽山 唐希 林丽钦
潘登 万瑜

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125号
邮编: 350003
电话: 0591-87831257
传真: 0591-87816430
电子邮箱: wswb@sina.com
印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 2023年9月
《准印证》编号: 闽内资准字A第031号
印刷数量: 1500册
发送对象: 系统内发送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 第一个访华团背后故事

◆郑松波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large group of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posing in fron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temple building. The group is arranged in several rows, with some individuals kneeling in the front. A white car is partially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rame.

经过一年多的申请，又经赵朴初先生居间协调，方获得中国方面批准，终于在1979年12月9日至21日成行。1979年12月13日，日本佛教黄檗

古黃樂洋塔友好訪問 庭意書

4 Fu Zhou Wen Shi |

宗第一次友好访华团一行二十人到达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访问，向寺院赠送了佛教文物书籍和法器礼品，从此，中日两黄檗开启了新时期交流的大门，两国黄檗之间交流络绎不绝，直至如今。

黄檗宗第二次友好访华团一行20人，在宗务总长盛井了道率领下，于1980年11月13日抵达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代表团向寺院赠送了有关资料和礼品，其中有隐元禅师传给日本的“黄檗文化”资料和书法对联等。当时，中方寺院亦请福建省政协委员、书画家陈鹤绘制福清黄檗山龙潭瀑布胜景一幅和撰写“隔海东西双黄檗，渡江南北一禅宗”的对联回赠日方。

1980年6月20日，以山田无文长老为团长的日中友好临济黄檗协会第一次访华团一行二十三人到达中国。此行，他们访问了北京、河北、河南、上海、浙江等地。

日本黄檗宗成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第一个发起访问中国的宗教文化团体，也开启了中国结束“十年社会动荡岁月”后的中日正常宗教文化交流。

当天，中日黄檗人士重温了这段友好交流历史，纷纷对黄檗先辈们为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创下的功绩表示钦佩和敬仰。

中国福清暨日本一般社团法人黄檗文化促进会会长林文清说，今年是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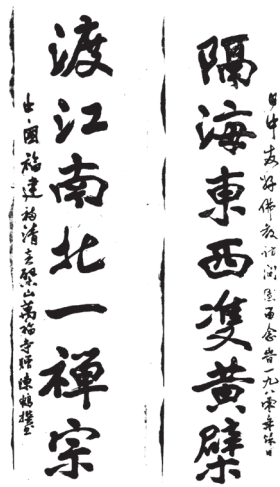


中日黄檗人士观看老照片

约》缔结45周年的特殊年份。我们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积极的行动，来促进中日两国世代和平友好下去。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创建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89），至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这里名僧辈出，是中国禅宗著名的丛林。唐代高僧黄檗希运在此出家，其弟子义玄在河北正定创立“临济宗”，成为现在佛教禅宗重要一支流派。临济宗于宋代由日僧荣西传入日本，成为当今日本佛教主要流派；明末清初，中国高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禅师应邀东渡日本传法，当时德川幕府尊崇隐元禅师，挽留他在日本开山立宗，后日本皇室将京都附近宇治地区的一片土地赐给他建造寺院。隐元禅师出于对自己家乡的深切挚爱，将新建寺院亦命名为“黄檗山万福寺”，开创黄檗宗，流传至今成为日本佛教主流之一。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福清黄檗山万福寺被誉为“临济祖源、黄檗祖庭”，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明末清初时期，以隐元禅师为代表的众多侨僧侨民东渡日本，不仅传播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华夏文化，涉及思想、建筑、雕刻、印刷、绘画、书法、篆刻、印刷、音乐、语言、文学、饮食、煎茶、制药、医学等方面，流传后在日本被称之为“黄檗文化”，深刻影响了江户时代的日本，直至今日。



中方回赠日方书画作品

漫谈生产队到福州挑肥那些事

◇林展飞

1958年，毛主席根据中国农民群众生产实际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三农问题是国家的大事。农业生产要获得丰收，土地深耕、改良土壤排在第一位；增加肥料、合理施肥排在第二位，可见合理和科学施肥对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笔者高中毕业回乡劳动，亲身感受肥料对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队为获得肥料，采取了多种形式。笔者曾经参与生产队积肥和到福州挑肥，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1974年夏，笔者在闽侯祥谦中学（今闽侯二中）高中学习毕业，回到祥谦公社洋下大队第四生产队，成了一名社员，马上投入早稻收割和晚稻插秧劳动。生产队为了改良土壤，割早稻时都留下几寸长的稿头。刚割过的稿头还是活的，会长出新芽，要及时耕田，俗称“打稿插”。我刚参加生产队劳动，体力不够，“打稿插”相对轻松一点，有时觉得劳累，就会选择去“打稿插”，工分相对也会低一些。“打稿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把刚割下的稻杆压到泥土里，放水浸泡，使稿头腐烂。第二阶段是几天后再耕耘，把泥土耕烂。第三阶段施基肥，把田耕平，为插秧做准备。冬季对稻田进行深翻、曝晒，组织社员种蒲公英、栽蔬菜、挑河泥，以达到改良土壤、提高

肥力的效果。

当年生产队肥料紧缺，又没钱买化肥，如氨水、碳铵、尿素等化肥，想买还需凭票供应。生产队肥料来源，一是向社员征集，二是到福州城里购买。向社员征集，即社员把自家的粪使用粪桶挑到生产队粪池，一担约1元钱；为防止社员在粪中掺水，生产队用一种叫“粪磅”的仪器来



割早稻

测量粪的浓度，浓度高的加一点钱，浓度低的减一点钱。社员各家都养一两头猪，平时把猪大便收集到土坑内，坑满了就挑到队里，每百斤给2元钱。到福州城里买肥料有三种方式：一是买一手粪便，二是买二手粪便，三是购买废氨水。

一、到福州挑粪历史久远

闽侯县七里一带(今祥谦镇、青口镇、尚干镇)到福州挑粪历史久远。民国时期，有粪商在台江边修造几艘“粪蓄”(木制的像船一样大形粪箱，不能行驶，常年囤积粪便)，雇用倒桶嫂和挑粪伯将居民粪便收集来储存，然后卖给农民，七里农民称这些粪商为“粪头或粪霸”。1997年版《台江区志、城区建设》载：“民国时期，粪便主要由民间自由买卖。公私厕粪便由粪商包办投标承包或包销。民间马桶粪便多由倒桶嫂和农妇收集。沿街叫买粪的自收户则主要收集粪坑、尿坑粪便。”七里殷实家庭多在春节前后到福州买粪便，放在自家粪池内备用。这段时间价格优惠。春节期间市民生活好，粪便质量也好。过后时间买粪人多了粪源不足，那些“粪头或粪霸”便掺河水，降低粪便质量，或掺些紫铜色废水，骗说是陈年粪水。相传早年七里有农民在临近端午节时期，见水稻生长差，租船去台江“粪蓄”买粪便施用，过十几天仍未见稻禾转青，便去质问“粪霸”：“你说粪肥施后会长‘大稻’，怎么一点都不转青。”这个“粪霸”振振有词地说“我的粪肥是泼‘大稻’的，你这么差的稻禾怎么能转青？”后来人们编了一首歌谣：“南雷屎，南雷尿，南

雷水粪泼大稻(南雷指台江，大稻指生长茂盛的水稻)。”用来讽刺伪劣粪便欺骗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州市建设局即开始着手拆除部分旧厕改新厕，台江边上不卫生的“粪蓄”也拆除，成立粪肥管理处统一管理，村民粪船到福州买粪肥要到粪管处购买，有熟人介绍会方便一些。

二、到福州购买第一手粪便

早年村里有一些家庭迁居福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招工从事环卫工作。族亲林佳宰住台江区小桥附近，在环卫部门工作多年，对小桥附近的粪池管理情况比较熟识，且为人热情，关心家乡事务，生产队买第一手粪便都先派一位社员找林佳宰了解情况，请他牵线搭桥找环卫部门的领导，在小桥附近承包下一口公厕，谈好价钱，我们称之为“购买第一手粪便”。买公厕粪便可避免公厕满溢状况，减少环卫部门转运至蓄粪池的费用，价格相对便宜。生产队租一艘粪船，挑选十多位体力好、为人亲切稳重、不易与人争吵的社员。挑到的社员都会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一点，带着大米、小菜(主要是咸菜，不易变质)、粪桶，趁濑江落潮时随船出港。挑肥用的粪桶形状像一对花瓶，俗称“花瓶桶”，是闽侯七里地方特有的造型，每担可挑180斤左右。船到乌龙江与白龙江交汇处的三江口等涨潮时再驶往台江，停泊在小桥附近离所承包的厕所较近的河道上。

小桥地区特别热闹，街道繁荣，路上车水马



闽侯县祥谦镇田园

龙，人来人往，挑粪时要小心翼翼，粪液不能滴漏，更不能触碰行人，一个个挑得汗流浹背。其实挑粪时根本不会碰触到行人，人们见挑粪的过来，很远就掩着鼻子避开了。许多年轻人看着灯红酒绿的街道，满大街年轻男女打扮时髦、相依上偎压马路，非常羡慕，反观自己，有点自惭形秽，总觉的低人一等，不敢正眼看人。社员林培元回忆当年挑粪情景依然感触很深，他说：“挑粪还不算苦，挖粪池底才是一项又臭又累的活，粪池底下沼气很重，很容易中毒晕倒。每次挖粪池底的活都是他去，下池时先喝几口地瓜烧，以便杀菌；用万金油涂抹在脸上、手上、鼻子下，防臭味和虫咬。挖粪池底有时会捡到一些硬币，有额外收入，为了捡些硬币，有的人还抢着下去。”时任生产队长林展桂回忆当时情景亦然深有感触：“当时公共厕所间清理时可以人工下去，但保护条件差，没有防护衣等，只是穿塑料雨衣，脚上套塑料袋，全身绑紧，嘴上戴口罩，喝点高度劣酒。时刻关注下去社员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赶紧叫上来。为鼓励社员下去掏粪，给下去掏粪人员多记些工份，或是大家轮流下去。过去的公共厕所间和现在的冲水式公共卫生间不同，大便坑小便槽直接在粪池，粪池底有部份硬币捡起来冲洗后可用的，其他东西都是坏的不能用。记得有次捡得硬币较多，直接去附近的聚春园馆店吃饭，店里的人员烧了一桶开水来侵洗，臭气冲天吓跑不少客人。”

挑粪期间十多位社员吃住在粪船上，船小人多，没有睡觉的地方，有时部分人只好住进林佳宰的家。住船上的人吃饭也在船上，煮饭的水用木桶从河里提上来，放在小水缸里澄清一下饮用。煮菜很费时，一般都不煮，吃些家里带来的咸菜。有人觉的到城市干活可以大饱眼福、吃香喝辣，其实是不可能的。住进林佳宰家的社员也很挤。林佳宰一家住房本就非常紧张，来了一大批人，只好把床铺腾出来，让乡亲们睡，一张1.5米的床铺横着睡几个人，翻身都翻不了。林培元回忆起住在林佳宰家里的情景，动情地说：“我们每个人的衣服都是臭气冲天，真是难为了他们

一家人。我们想到街上吃碗锅边配油条，改善一下生活，可几个人身上都没粮票，什么也买不到。每天早上林佳宰都是用自己有限的粮票买一大包油条回来给大家吃，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如果一口公厕粪量不够，就须另外收集粪便。1997年版《台江区志》第四篇城区建设载：“1956年，开始对市区粪便统一管制，规定所有粪便均应无偿归粪肥管理站，杜绝自由买卖粪便所带来的种种弊端，随后又提倡居民自端马桶放在门口待倒，改变以往倒桶嫂入室端桶的麻烦。”当年福州粪便管理主要两种形式，一是居民清晨把马桶端到厕所，倒入倒桶处；二是把马桶放在自家门口，环卫工作人员天未亮拉着粪车、摇着铃铛，逐家收集。1997年版《台江区志》第四篇城区建设载：“台江区倒桶点最早建于1956年，1964年提出‘消灭倒桶’的口号，福州市环卫处在台江区试行‘粪便自己倒’，提出凡汽车能通达的地方都设倒桶点，一时全区各街道、居委会兴起一股建倒桶点热。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大部分倒桶点建筑粗陋，倒桶点布局不合



挑粪工

理，甚至夹在民房中间，影响卫生，不久大部分倒桶点被逐渐取消。”天刚蒙蒙亮，城市还在睡梦中，社员们就挑着粪桶，分成两组，一组守在倒桶点，等待居民来倒桶。远远见有居民端着马桶过来，社员就要热情地迎上去，接过居民手上的马桶，倒入粪桶内，冲洗干净马桶还给她们，这样才会得到居民配合，顺利完成收粪任务。另一组则赶在环卫人员拉着粪车收粪之前，挑着粪桶到各巷子，把居民放在家门口的马桶倒入，如果迟了，被环卫人员先收走，就要赶紧换一条巷子收集。

环卫工人倒桶很人性化，他们将居民放在门口的马桶倒入粪便车内，并冲洗干净后，再将马桶放回原处，由居民天亮取回。生产队员挑粪图方便，偷倒马桶后并没有冲洗马桶（也没水冲洗），那些倒桶嫂、挑粪伯见粪便被倒了也不管冲洗，弄得居民怨声载道。

据生产队长林展桂回忆：“当年生产队在台江私自收集粪便是违规的，俗称‘偷担粪’，是要冒风险的。如果被环卫所工作人员拦截，重的会受到经济处罚，罚款是不多，最怕的是挑粪的‘花瓶桶’被环卫所工作人员当场收缴，他们装上车时会退掉‘花瓶桶’桶箍，剩下桶片，或损坏‘花瓶桶’，就算后来处罚后拿回，那也就完了，‘花瓶桶’很贵，一年的工份也赚不了多少钱，不够买一担‘花瓶桶’。若处罚的轻则是批评教育，做出保证后才行。”

三、到福州购买二手粪便

福州光明港附近，这里是城乡结合部，当地许多粪商专门做粪便买卖生意。他们在河岸边摆放一排排大陶缸，或是砌一些粪坑，从城区拉来粪便存放这里，等着农民上门采购，每担约二三角钱。我们到这里购买，是他们转手的粪便，称之为“二手粪便”。社员郑桂英回忆：“船到光明港后，找到当地粪商，讲好价格，就可挑粪上船。如果一位粪商不够，他们还会介绍其他粪商，保证数量管够。但这里的粪便质量不好，掺水很多。”船装满后，趁落潮开船回家。

有人以为，满满一船的粪便，肯定非常臭，人在船上会受不了，其实不然，人在船上一点也感觉不到臭。为什么会这样呢？

唐末五代时期，浙江省杭州有个人，叫罗隐，字昭谏，多才多艺，是位诗人，也是文学家、思想家。相传罗隐是“真龙天子”。玉皇大帝怕他当了皇帝，会捣乱乾坤，杀“万”家人，就派天兵天将在罗隐晚上睡觉时，换罗隐的“皇帝身”为“乞丐身”，由于罗隐紧咬牙关，“皇帝的牙床”没办法换去，后来罗隐虽做不成皇帝，却留下了一张“皇帝嘴”。“乞丐身”“皇帝嘴”的罗隐说什么就灵验什么，大家既想讨他说好话，又怕惹他讲坏话。有一个夏天，罗隐来到闽县一个码头，由于来迟了，渡船已经离开，回头又不甘愿，就在码头上东张西望，看见有一条粪船，就问船去那里，原来与罗隐同方向。罗隐上了粪船，要求船家带上一段。船家是个热心肠的人，愉快地答应了。粪船前部是空旷的，盖着甲板，后部搭有竹棚，可以挡风遮雨。这时太阳高照，烈日炎炎，罗隐后上船，见船尾挤满了人，只能站在船头，满身汗水不停地往下流，加上粪便臭味熏天，狼狈不堪的罗隐心生一计，对着船尾人群大喊：“你们真笨，这么多人挤在那里，多难受，赶紧出来，船头风大，人舒服。”船尾的人回说：“前面太臭。”罗隐说：“一点都不臭，不信出来看看。”船尾有的人还真的出来，感觉一点也不臭，就对船尾的人喊：“快出来吧，真的一点都不臭。”许多人就从船尾出来，在甲板上凉风。罗隐却偷偷地躲入船尾消遥自在。从此后，粪船运粪再也不臭了，这是罗隐对好心的船家一种回报，也是老天爷对农民的一种眷顾。

四、到福州购买废氨水

福州有一些工厂的废水也是很好的肥料，如福州硫酸厂的废水硫酸氨液，二化厂的硫酸氨液也很好的，都要钱买。工业路的味精厂，其废水中含有尿素，也可作肥料。

生产队常到福州购买废氨水。有一次，我跟随社员一起到福州氮肥厂挑废氨水。废氨水

其实是氮肥厂的生产废水，有一点养分。当时生产队肥料非常短缺，远远满足不了生产需要，氮肥厂的废水也就成了宝贝。为了得到废氨水，队里买了几头猪，请人杀了，清理的干干净净，租一条粪船，装上猪肉，带着十几位社员，我当时也入选跟船一起去，我们轮流摇着橹，趁着落潮出发。船到乌龙江与白龙江汇合处等涨潮，摇着橹到福州，在离氮肥厂不远的一条河道码头停靠。一部分社员把猪肉送到厂食堂，大部分人去挑废氨水，来来回回不知挑了多少趟。中午，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都到氮肥厂食堂吃饭，由于我们去的晚，厂里的职工已开始用餐，每张餐桌上都有几位职工坐着。我们买好饭菜，端在手上，不知坐那里，只好找有空位的桌子插入，这时非常温馨的事情出现了，厂里的职工自发地让出了两张桌子给我们，这一餐我们吃的很开心、很温暖。

那一天，我们一行在氮肥厂还出了一个大洋相。下午一点多，废氨水挑结束后，人人一身汗，带队的社员建议大家难得到这里，厂里浴室有热水，一起去冲个澡。浴室很大，厂里职工尚未上班，里头只有两三个职工在洗澡，非常宽绰。我们每个人都去，大家争先恐后脱光衣裤，墙面一整排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管道，阀门很多，我们都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浴室，不知怎么使用，要开那个阀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有个社员出风头，随便把其中一个阀门打开，只听“呼”的一声，声音很响，大家吓得一跳，接着跑出大量的热气，有人大喊这气有毒，也有人大叫会爆炸，吓得所有人来不及穿衣服，从浴室里夺命奔出，一个个非常狼狈，还好没人看见。在里面洗澡的厂里职工热情地告诉我们赶紧进来，没事，那是水蒸汽，把水阀开了就可以。这事我们回家后相互开了很长时间的玩笑。当时城乡之间真得差距很大，现在农村也发展得很好，城市有的东西，农村也很普及了。

运回来的粪便和废氨水如果是临时存放，废氨水装入氨水罐，密封好，以免漏气降低肥效；粪便则存放在生产队粪池内。有时直接挑到田

里，用于作基肥或追肥。

用于稻田基肥或追肥，根据每一丘田的面积，准备施多少担的肥料，事先都测算好，然后田里插上坐标，每担肥施在那里，安排专人在田里施肥，这样不会乱，也会均匀。根据稻田离粪船远近，每组安排几位社员，采取接力的方法，一人挑一段路，一个一个接下去，直到田里，这种接力的方法村民称为“接肩”，也叫“接担”。接担是背靠背，左肩或右肩都可以，但两人一定要靠得非常紧。相传“公社化”时期，某村男人大都学有传统手工艺，为了赚钱，多出外做工，只有少部分男子在村里干农活，生产队种田只好让妇女顶上去，所以队里男社员少，女社员多。有一次挑粪，女社员挑到半路，有个男社员接肩，这个男社员恶作剧，说背靠背接不来，要面对面接肩才能接的来，女社员不肯面对面接肩，两人互不相让，女社员挑着重担，耗不过男社员，只好同意面对面接肩，接肩时，两人离的太远，接不下，女社员只好让男社员面贴面靠紧紧的把担子接过去。从此这个男社员的名声传得附近地区都知道，这个村女社员再也不要这名男社员参加接肩，这名男社员也因此落的轻松。我习惯用右肩接担，因为右肩力气比左肩大。接担的过程有一定的技术，接不好两人都吃力。我刚参加生产队劳动，力气不如一般社员，但又不能不接，除非你不干，回家休息。所以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几年后，我长大了，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非常轻松。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农村再也不到城里挑肥，粪船退出了历史使命，江面上再也见不到了。生产队稻田实行承包责任制，社员各干各的，生产队接肩挑担方式也很难看到，留下的只是记忆和一缕乡愁，成为传统挑肥文化还在人们心中，也许再过若干年，连记忆也都淡忘了。

林森倡建忠烈祠

◇ 石丽钦

福州南公园东面忠烈亭内，静静地立着一块颇有年代的古石碑，条石长、宽、厚大约分别为1.2米、35厘米、15厘米，竖刻“忠烈祠界”四个楷体字。石碑旁新设立了一方土黄色土石块，横刻“忠烈祠遗址”五个楷体漆红大字。这里就是林森倡议兴建的忠烈祠所在地，也是中国最早的花岗烈士纪念祠。

林森（1868—1943）是辛亥革命元老，中华民国参议院首任议长，后任国民政府主席长达12年。林森一生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爱国之志终生不渝。作为一个“平民元首”，他为官一生清正廉洁、不慕名利、自律甚严，担任福建省长去职时，随身只有两个包裹作一肩挑。时称“一挑行李，省长搬家”。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战友，林森“自入兴中会至今，无一事无一役不是笃行革命宗旨而不稍避”，这是孙中山先生对他的高度评价。林森早年在台湾即参加过反抗日本占领者的战斗，组织地雷队，浴血沙场。1911年，当武昌爆发起义后，他积极策动九江新军和海军主力舰队举义，还率军驰援并直接指挥了武昌保卫战，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卓著功勋。民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临时参议院议长、大元帅府外交部长、立法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他积极修倡导兴建黄花岗烈士陵园，亲自向海外募捐，借以纪念先烈，弘扬浩气。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他为督建中山陵，在陵园工地旁住了整整三

年，完成了这一举国仰望的重大工程。林森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旗帜鲜明，坚决抗日、抗击法西斯的侵略，代表国家宣布向日、德、意三国宣战。林森是国共两党共同认可人物，从1943年8月1日，林森逝世后，极具哀荣，享誉甚高。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唁电称赞“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新华日报》发表《为



林森



忠烈祠遗址 林钻/摄

元首逝世致哀》社论评价：“林主席承继国父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十次起义，尤以辛亥三月的广州起义为最壮烈，惊天动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它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前奏，功业极其伟大。孙中山先生评价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葬于岭南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闽籍烈士超过四分之一，达23人之多。他们为国捐躯，视死如归，悲壮无比，不愧为八闽人民的优秀子弟。

林森对黄花岗烈士情有独钟，特别是烈士中有许多都是林森所创建的福建学生会的亲密同志。林森在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祭文》中写：“维民国八年夏历三月廿九日，为我广州发难七十二烈士殉国之期，闽侯林森谨以香花清醴鞠躬致奠于先烈之灵，而申之以文曰：庄严民国，先烈基之。舍生取义，身没名垂。黄花碧血，凭吊凄其。建设维持，责在后死。奈何开国八载，于此神奸巨慝接踵而起。…”在《对联》部分里，林森写有：“拼一死，救众生，遗恨在重泉，碧草当春犹怒发；创共和，摧专制，丰功镌华表，黄花无恙许长开。”林森还为林觉民给父亲和妻子的《诀别书》（即《与父书》《与妻书》）推荐刊行而广为流传。他写有《林觉民烈士禀父书及致

妻诀别书墨迹跋》，感人肺腑。《跋》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碑上所勒属闽籍者十九人其中十人尤著，世称十杰，林烈士觉民其一也。林烈士已有俾登森等所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中，进春，承林烈士尊翁可山先生寄示林烈士绝命书两件，慷慨凄怆，至情至性，仁人与孝子相成，儿女与英雄并见。嗟呼！谁无父母兄弟妻子，烈士以爱天下人之故，牺牲其一身与其父母兄弟妻子之爱，融小我于大我，力扩小爱于大爱，惟烈士能用爱，亦惟烈士能用情矣。…”他高度地评价



忠烈祠旧影

烈士的精神说：“这些烈士的躯体虽然牺牲，但是他们不死的精神及英名，是永远留在霄壤之间，与天地同一不朽，可以说得死重于泰山了。”林森的黄花情结永远是那么的深，那么的浓。

1912年3月13日，由林森提议，福建都督府决议将福州城南原耿王庄左公祠（在今南公园内）改建为纪念辛亥革命烈士的忠烈祠。“政务院前经议定，以满清将军署改建烈士祠，嗣以该署破损甚多，现驻军队又未能即时迁涉，兴工无期，殊无以慰邦人景仰之诚。乃以3月13日，议以水部耿王庄左公祠改为烈士祠，土木即兴，而观瞻又极宏壮；并令民政可知照土木科，从速办理。”（民国《福建辛亥光复史料》）

先烈祠又名忠烈祠，位于南公园东隅的左公祠旁，后改名为辛亥革命历史文物陈列馆，为当年进出公园的必经之处。定每年农历三月廿九日举行祭典，省、市领导者均来参祭，缅怀先烈。辛亥革命历史文物陈列馆设有专职机构，馆长吴适，副馆长施卫民。忠烈祠坐北向南，砖石结构，多层建筑，呈城堡形。左右均为3层“城楼”，楼顶有尖塔，互相对称。中为拱形石门，门上端嵌3块方形石匾，每块写1个字，从右到左书写“忠烈祠”3字，行书体，遒劲飘逸。城堡上开有圆形或长条形窗户，各层设有阳台。祠前左右对称耸立水泥钢架旗杆塔。整座建筑具有中西合璧的风格，宏伟壮观。祠内设有展厅，展示19位闽籍黄花岗烈士英勇事迹，彰显先烈们英灵不朽。

1915年，国民政府在台江南公园兴建纪念



忠烈亭与忠烈祠界碑



南公园大门

辛亥广州起义黄花岗闽籍烈士的“忠烈祠”，忠烈祠中供奉辛亥黄花岗起义19位闽籍烈士的名单是：

林觉民、刘元栋、冯超骧、刘六符、林文、陈更新、陈与燊、方声洞、林尹民、陈可钧、黄忠炳、卓秋元、罗乃琳、胡应升、王灿登、林西惠、魏金龙、陈清畴、陈发炎。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福州各界群众在南公园忠烈祠里举行追悼会，隆重祭悼烈士。忠烈祠成了一个缅怀先贤、激励人心的富有政治和教育意义的纪念地。1937年抗战前夕仍完好无损。福州两度沦陷时期，遭到日军严重破坏，甚至作为日军关押、杀害我同胞的地方，祠内大部分建筑物和文物被毁，一片荒凉。1946年，只剩空壳，徒有四壁，最终圯废。2016年，台江区政府在忠烈祠原址建造“忠烈亭”，供人崇祀和纪念。

今年是辛亥革命112周年，我们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烈时，作为辛亥革命元老、老一辈民主革命家、长期忠实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林森理应在纪念之列。林森不仅是福建乡亲公认的乡贤，而且是近代中国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历史应当为林森留下一席之地。同时建议复建南公园忠烈祠，这将有助于弘扬辛亥革命精神，重塑民族集体记忆，有利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促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琉球进贡口岸为何迁移福州

◇孟丰敏

今天日本的冲绳县即大琉球(小琉球在台湾)自明朝开始属于中国的藩属国。明朝后,大琉球被直接称作琉球,其在中国的进贡口岸最初在泉州,由泉州的福建市舶司管理,后迁移到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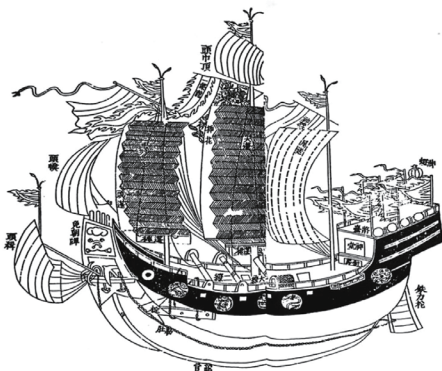
琉球进贡口岸迁移福州的最关键原因有两个,一是与福建市舶司有关,二是因为朱元璋和朱棣两次各派闽人十八姓去琉球当官,其中多数皆为福州河口人。

两宋时期,福建市舶司设在泉州。龚用卿在《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序》中说:“福建提举市舶志官不常置,自宋绍兴二十一年,李庄始为之;嗣后废兴沿革,代不相袭。至始志气官,以督理蕃市之事,然不专为琉球设也。迄于今,始为琉球专其官矣。”说明福建市舶司最初虽设于泉州却经常不办公,且时设时废。自宋绍兴二十一年至元末没有发挥太大作用。不仅如此,福建市舶司设在泉州时不是为了琉球进贡之事,而是为了管理外国商人的贸易市场。

元朝重用南宋时期的泉州市舶官员蒲寿庚(穆斯林海商),也沿袭了南宋的市舶司制度,在泉州、宁波、上海、盐城都设立了市舶司,而且命令福建行省向外国商船宣布:“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等于比两宋时期更加提倡外贸,而且贸易的自由度更高,也不规定对口贸易,这样各国外商就纷纷涌入泉州,而且“各从所欲”,就是可以实施内部自治。他们在泉州就成为了自己

地盘上的世袭领主。其实早在南汉时期,外商就可以在社区内部有自己的民事或宗教长官管理,与后来清末的租界情况非常相似。这是南汉时期的特色政策,所以那时的广州与福州是当时东亚最大的港口。元朝政府也积极提倡外商内部自治来吸引他们,令元朝的海外贸易发展得特别快,福州和日本、高丽、泰国、越南等国的贸易长期都有。

明初,南洋和葡萄牙、西班牙等各国外商贡市只能在广州后,就不能像元朝时期在中国国内到处贸易,甚至想要获得和中国贸易的资格必须明政府同意。而泉州被限定为仅通琉球,海禁之后,泉州市舶司就变成为琉球国进贡专设了。这样一来,泉州的海上“走私”大盛。明代中后期,走私港转移到漳州的月港,泉州的后渚港(第一大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下降了,泉



《中山传信录》中所载封舟图

州的福建市舶司的职能也就被削弱了。明政府的这一系列规定导致泉州外商生存困难，发生了多起色目人的武装叛乱和混战，使泉州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很多外商从此离开了泉州。

那么，明初福州是什么情况呢？明初，朱元璋派驸马王恭来福州抗倭寇时，王恭顺便重建了福州城，又建了一座样楼观海即观测海上船只，后来成为著名的风水楼、风景点——镇海楼。重建后的福州城范围比原来更大了，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社环境较泉州稳定，更吸引琉球国贡使和商人。

再说福州港。明初政府厉行“海禁”，只许琉球到泉州贡市，但福州为八闽总会之地，其历史文化、衣冠文物在福建省中积淀最深厚，而且福州港长期对外贸易航路广阔。当朱元璋命令“片板不许下海”时，全国许多港口都难逃打击，只有福州港独受青睐。郑和下西洋的船只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这样沿着东海往南一路顺风顺流漂到了福州闽江口的五虎门和长乐太平港停泊。在此停泊有两大原因，一是等候季风再出航，二是检查、修补海船，三是训练水手、下船休整，四是物品补给。郑和团队的停泊时间根据季风情况，至少两三个月，多则半年以上。郑和下西洋经过福州，奠定了明初福州港的海外贸易地位。《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永乐二年（1404），明政府发放给日本的勘合文表即如今的通行证或护照有两册，一册封存在北京礼部，一册保存在福建布政司作为档案检查。每次日本船只要到宁波去，必须先到首府福州港登记、接受检查，查验没问题后才能转到宁波贸易。所以，即使福建市舶司设在泉州，福州港的贸易地位也一直没有下降过。

福州港口的重要性还不足以让福建市舶司迁移到福州。这就要说到第一个原因闽人三十六姓。明初去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多是福州人，而且有文化的人就可以在琉球任大夫长史等官，其他的或在琉球的贡船上充当贡使或翻译，都是为了到福州交流的方便。因为福建的重要官员都在福州。明初的福州是闽江流域货物集散的中枢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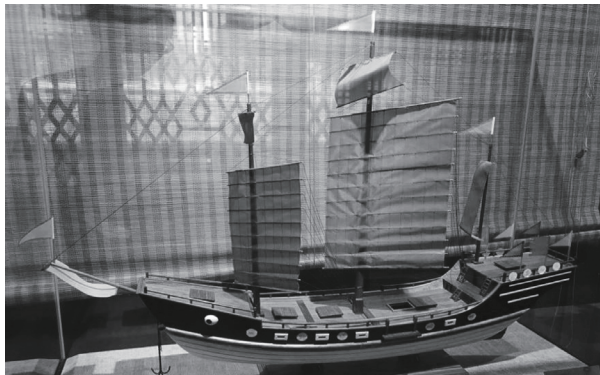
区，历来就有“工商辐轴”之称。《闽部疏》记载：“凡福之油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尤不可计。”《琉球国志略》记载，明正统四年（1439）巡按福州监察御史成规上疏：“琉球国往来使臣俱于福建停憩，馆肴之需，所费不貲……其茶、盐、醋、酱等物，出于里甲，相沿有例……已行福州等府县。”这里说的“福建停憩”就是指在福州休息。为何要到福州停泊休息呢？琉球贡船到福州比到泉州更近便，而且贡船必须到福州港登记、接受检查，查验，所以来福州基本是必须的事，琉球贡船上也必须要有福州人。琉球贡船的翻译们也可以借机回老家福州。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外，第三个原因和地理气候有关，琉球群岛的气候为高温多雨。那霸（古琉球王国首都首里城遗址所在）正对着福州，气候与福州也颇相似，雨天多，尤其五六月雨量大增，吹的是南及西南风，航海贸易通常是按照季风的规律出返，这样一年内就能往返，并且省事、海上风险小、利润高。从福州出发去琉球，都要在五六月吹湿润的西南风时，就能顺风到达琉球。到了十月就借干燥寒冷的东北风回福州。此外，琉球和福州的航线上一路都有岛屿方便船只避风停靠。而浙江和琉球之间没有合适的风向助力推送，也没有岛屿可停泊，风浪大也不利于航行，所以各种历史记载中浙江出现琉球船只的基本都是航行中受到气候影响，漂流到浙江。于是，明初当外国军事力量以贸易为借口进入中国内部时，明王朝规定对口贸易，广东市舶司对口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南洋朝贡。浙江市舶司依旧对口日本。这种规定和借助海上季风的航行便利有关。福建市舶司变成专为对口琉球而设。而且强调的是“朝贡”贸易，私人贸易只能在朝贡的名义下进行，船货必须在设有市舶司的港口进行贸易。

第四个原因，为了主管官员加强对市舶司的管理。话说北宋的经济靠市舶关税来支撑，以至于南宋高宗忍不住感慨道：“市舶之利最厚。”市舶司设在泉州时已经出现很多贪污腐败事件。《礼部志稿》卷九十二记载：先是浮海之商以死

易货，至则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买”，实不给一钱。殫珠象齿、通犀翠羽、沉脑董陆、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权近，饰妻妾，以为常。”明代沿袭前朝制度，市舶司隶属于布政司，税收大权完全掌握在布政司等长官手中。福建的布政使（官品为从二品，掌管一省的民政、田赋、户籍）掌管税收，看到奇珍异宝，自然担心泉州的贪污腐败问题更加严重，就要想方设法把市舶司迁来福州管理，也便于巧取豪夺。明末，政府采取了定额的包税制，才改由市舶司的提举负责征收。由此可知，中琉的贸易市场之大。

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造船中心在福州。这件事就说来话长了。汉武帝打败野心勃勃的枭雄东越王余善后，为了高枕无忧，下令把冶都（福州）的全部建筑烧毁，把福建境内百姓全部迁移到浙江去。福州此后三百年内几乎成为蛮荒之地，基本回到了新石器时代。福州是怎么恢复起来的呢？那是三国时，建衡元年（269），东吴政权在建安郡侯官县（今福州市），设立“典船校尉”一职，掌督造海船，建立温麻船屯，利用谪徒（罪犯）和征集当地工匠、劳工造船。这就是福州恢复为政治中心的唯一理由——为了监督温麻船屯（今福安市和宁德市霞浦县境内），说明福州造船历史之悠久。至宋朝，福州工匠已掌握了全国最一流的造船技术，并转向民间造船。宋时福州已能制造重量很大的“三千斛”大船。这种船有多根桅杆，构造坚固，隔舱防水，并安装了指南针以辨认航向。当时还出现了专门向外商出租船舶的业主，据《宋会要辑稿》载：“南宋乾道四年



册封舟复制品（福州琉球馆藏）

（1168年），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后来宋朝规定，福建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分三番应募把隘”。有学者据此测算，仅福州一地，面阔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至少有300艘以上。

明朝靠航海贸易发展经济的琉球为了提高造船工艺水平，时常派人来福州学习造船，也在福州造船和买船。当年，福州的造船厂设在今天的台江区河口市场一带。20世纪八十年代，福州台江区的闽江边依然还有造船厂。

总而言之，促成福建市舶司迁到福州的原因是综合的，比如地理、人文、政治、经济等诸多原因。明成化十年（1474），明朝初设在泉州已十二年的福建市舶司迁移到了福州。明《神宗实录》明万历六年（1577）十一月辛亥条载，兵部题：“国初于闽、广、两浙设三市舶，不徒督理贡事，亦以牵制市权，意固深远。寻以浙江多故，旋改旋罢，惟闽广二舶尚存，而广南番船直达省下，禁令易行。福建市舶专隶福州，惟琉球入贡一关白之。”福州港成为明政府批准的全国三个公开对外贸易和信使往来的重要港口之一。而泉州的福建市舶司从北宋到明初历时380余年的使命至此结束，福州自此专司对琉球贸易事宜。但福州的中琉之间以“朝贡”和“册封”两种形式进行，其中以“朝贡”为主。所谓“朝贡”即在明政府的控制下，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航路进行有限的贸易。

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来福州，标志福州港取代了泉州港“朝贡贸易”的地位。但由于市舶司的海关税收支撑着国家的收入，同时又引来外国海盗侵犯沿海边境，为了抗倭导致市舶司也时兴时废。尤其明朝嘉靖元年，因为倭寇侵犯沿海城市，全部的市舶司皆被罢免，直到嘉靖三十九年才恢复。嘉靖四十四年，福建市舶司又被罢免，到了万历年间才恢复，此后直至明末不再变化。清朝，由于禁海，福建市舶司没有再恢复。1684年，康熙帝力排众议，下旨开海贸易，福州在中洲岛瓦公祠设立中国第一个海关——闽海关福州分口。

福州南公园与著名历史人物

◇徐心希

1840年之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激起无数革命志士奋起抗争。就在人们熟知的南公园，也曾经发生过著名历史人物抗击外来侵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笔者以为本着紧密联系台江区历史文化的原则，根据南公园的历史与现状，可以着重研究左宗棠、沈钧儒、何遂、林亨元、吴石等著名历史人物。

一、左宗棠创建南公园

1. 左公一生戎马生涯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晚清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他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他曾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府，并与陶结为亲家。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后曾经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为平定太平军运筹帷幄。咸丰六年（1856）升任兵部郎中。同治元年（1862）经曾国藩举荐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并组成中法混合军和扩充中英混合军与太平军作战，克金华、绍兴等地，升任闽浙总督。同治三年（1864）克杭州，并受封一等恪靖伯。之后致力于剿灭东南太平军残部。同治五年（1866）在福州马尾办船厂，

即后来的福建船政局，又创办求是堂艺局，培养海军人才。同年，改任陕甘总督，其间创办兰州制造局。后创办甘肃织呢总局。此为第一个机器纺织厂。同治六年（1867）2月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定“先捻后回”方略，次年参与平定捻军。同治十二年（1873）12月14日授协办大学士，次年9月18日授东阁大学士。光绪元年



左宗棠

(1875)5月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二年(1876)定“缓进急战”方略,指挥刘锦棠、金顺诸军讨伐阿古柏、白彦虎,次年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并为新疆建省开发等预作规划。光绪四年(1878)3月由一等恪靖伯,晋二等恪靖侯。光绪七年(1881)2月入京任军机大臣,10月改任两江总督。光绪十年(1884)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9月以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光绪十一年(1885)年9月病故于福州,谥文襄。后归葬于长沙石门乡相竹村。

2. 左宗棠与南公园

南公园位于福州国货路,原为清初靖南王耿继茂的别墅花园。这座耿家别墅花园占地4.2万平方米,内有蜿蜒曲折的长湖,并有假山、亭台、回廊等,还在花园周边饲养从广州带来的印度象、白鹤,寓意着“玉带环腰”“万寿无疆”。至今尚留下了“象园”“鹤存”等地名遗址。康熙十二年(1673),清廷下诏撤“三藩”,耿精忠反叛,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恢复衣冠,与吴三桂合兵入江西,被清军镇压,兵败投降,他袒身露体,率文武百官出城至福州洪塘迎降。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待彻底平叛“三藩”后,康熙秋后算账,当耿精忠奉诏入宫觐见之时被逮捕,凌迟处死。耿氏被杀后,王府被废,花园被没收,后归烟商陈恒猷所有。

同治五年(1866),花园辗转由官府收回。闽浙总督左宗棠在园内设桑棉局,发展纺织业。民国4年(1915)辟为公园,因地处当时城区南部,故称为“城南公园”,简称“南公园”。清初耿家别墅花园占地4.2万平方米,有台榭林泉之胜。内有蜿蜒曲折的长湖,并有假山、亭台、回廊、曲榭等,风景迷人。后耿继茂之子耿精忠反清失败被杀,王府被废,花园没官,转为烟商陈恒猷所有。同治五年(1866)官府收购后,闽浙总督左宗棠在园内设桑棉局。左公卒后,官方遂建左公祠于园门(今龙津街),成为入园必经之地。园内的荔枝亭楹联云:“亭馆问谁家,数里莺环排绿树;蚕桑兴美利,沿村衣被胜黄棉”,对左宗棠提倡发展蚕桑纺织业之举深表赞许。光绪年间,王

凯泰督闽令修复花园,并广植梅花,改名为“绘春园”。园内台榭林立,湖水澄碧,不亚于苏州园林。

3. 南公园的历史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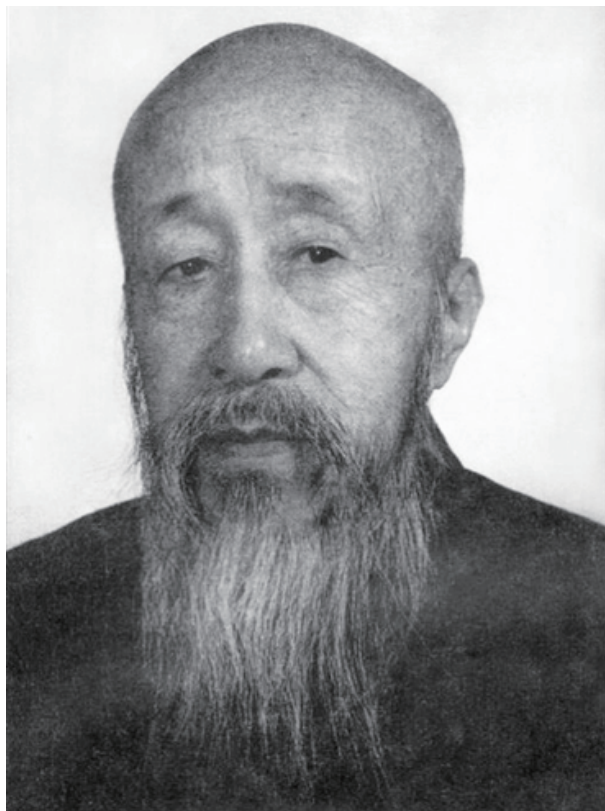
1915年正式辟为公园后,改从今门出入。后为纪念辛亥革命闽籍死难烈士,经林森提议,在公园中建造忠烈祠。园内尚有桑柘馆、荔枝亭、藤花轩、藕池、望海楼诸胜。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民众抵制日货,就在公园内建国货陈列馆,立“请用国货”石碑于馆侧。抗战中公园遭日军严重破坏,建筑物大部被毁,一片荒凉景象。忠烈祠也曾一度为日军关押、屠杀我国同胞的地方,后终圯废。1952年南公园改名为“大众公园”,1962年又恢复南公园旧名,并铺设园内道路,遍植堤岸,将左宗棠祠堂拆建为影剧院,又移来凤池书院的木牌坊作公园大门。公园于1966年“文革”后曾一度改为他用(相当多的房屋改为部队仓库)。1972年重新开放,面积缩为2万平方米,重砌曲曲折折的堤岸,再围以栏杆;又在湖上改两座木桥为石拱桥,其中一座桥沟通了湖畔假山与湖心小岛的凉亭。临湖建双层楼船,可登临眺望公园全景。1984年又在原有基础上大加修葺,园门额改书“南公园娱乐中心”,作为综合性娱乐场所,添置许多儿童游乐设施和开辟老人娱乐场所,开放卡丁车等等,记得笔者还带小孩开过卡丁车。还举办过多次的进出口商品展出。2015年后进行大规模改建。南公园占地面积约45.9亩,是福州最大的古典园林公园。改造工程结合历史和现状,力图恢复南公园的历史面貌,同时兼顾福州地方建筑特色而进行设计。2016年国庆节前夕已经全部竣工。此外,改造工程还运用了“海绵城市”的生态建设概念。园路采用青砖、透水砖等渗透路面,在混凝土垫层每隔50厘米左右打一个孔,使得雨水能从地表渗入地下最终汇集至湖中。与此同时,园内的绿地土包四周都分布着生态草沟,顺势流下的雨水通过管网对人工湖水体进行补充。湖中饲养着鱼类,并种植了水生植物,可对湖水进行自然净化,另外再辅以人工净化保证湖水的洁净。

总之，左宗棠在南公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风风雨雨中，留下了重要的足迹，也是清末富国强兵的领军人物。

二、法学专家沈钧儒

沈钧儒（1875-1963），清光绪时进士。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1909年夏，沈钧儒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杭州师范大学前身）监督（校长）。1918年6月，广州国会递补沈钧儒为正式议员，到广州参加参议院活动及参加制宪，1919年9、10月间，为破坏段祺瑞政府的武力统一计划，衔命赴闽潜入浙军潘国纲部，使该部脱离北洋军阀指挥，保持中立。期间主要活动与住宿在南公园一带。1920年9月任护法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0月离职回沪。回沪后，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以写作为生，著《家庭新论》论述家庭问题及社会问题。1922年任《中华新报》主笔。同年6月北上，任国会参议院秘书长。8月，当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后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学院，1950年并入上海财经大学）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沈公曾经在南公园一带居住并且工作。1927年秋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他坚持民主办学，主张学术自由和自由结社，培养了不少法学专门人才如著名法学家沙千里、林亨元等。1933年创办正行女子中学，任董事长，1935年又亲任校长。同时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以敢于主持正义不畏强豪而称誉于律师界。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上海分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4月，为营救被捕的陈赓等人，与宋庆龄、蔡元培等7人当选为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委员。辛亥革命1950年并入上海财经大学）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沈公曾经在南公园一带居住并且工作。

他是优秀的法学家和教育家，又长期奋斗在



沈钧儒

民主革命第一线。1927年秋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坚持民主办学，主张学术自由和自由结社，培养了不少法学专门人才如著名法学家沙千里、林亨元等。1933年创办正行女子中学，任董事长，1935年又亲任校长。同时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以敢于主持正义不畏强豪而称誉于律师界。1933年4月，为营救在沪疗伤而被捕的红军将领陈赓等人，与宋庆龄、蔡元培等7人当选为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委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一二八”战事爆发，他全力以赴支援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1935年12月他与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进步人士马相伯、邹韬奋等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任执行委员。次年1月，扩大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任主席。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狱。为了抗日救国，沈钧儒等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屈

不挠进行斗争。“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于1937年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1938年10月沈公到重庆，自此，他便主要围绕着坚持持久抗战，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民主，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反对独裁；要求早日实施民主宪政等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终为国民党所不容，被排除在1942年7月公布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名单之外。1939年9月初与邹韬奋、章乃器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为调解国共冲突，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第三党性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2月救国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当选主席。1946年1月任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和中共代表密切合作，争取和平、团结、民主、统一。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沈公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在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后，于11月26日秘密离沪赴港，与章伯钧、周新民等于1948年1月领导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中间路线，恢复领导机构，重新确定民盟的路线和政策。全会决定沈钧儒与章伯钧以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同年5月代表民盟及人救会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并秘密离开香港，于9月29日抵达哈尔滨。与中共中央代表就有关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进行协商，形成了决议。1949年2月到北平，任民盟出席新政协代表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在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建国初期建立人民的法制体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做出了很大贡献。建国以来，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49年12月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副主席。1953年当选为民盟中央第一

副主席，1955年张澜主席逝世，沈钧儒任代理主席。次年，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直至去世。著有《寥寥集》《家庭新论》《制宪必携》《宪法要览》《普及政法教育》等。他与台江红色历史文化的交集主要体现在精心培养与教诲入室弟子林亨元。

三、辛亥革命元老何遂

1. 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北伐战争
清光绪三十年（1904）何遂进入福建武备学堂，结识了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等革命党人，开始参加反清革命活动。三十二年（1906）毕业后，到南京在第九镇当排长。翌年，考入河北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称陆军大学）。同年由方声涛主持仪式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发展革命组织。宣统元年（1909）秋，何遂在陆军大学第二期毕业后，到广西训练新军的机构“督练公所”参谋处，担任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并和耿毅、刘建藩、杨明远等几位同盟会会员，创建同盟会广西支部，耿毅任支部长，他任参议，努力发展组织，出版《南报》（后改为《南风报》），宣传革命思想。

武昌起义爆发时，何遂是清军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是革命党人，正当准备起义、直取北京时，不幸被清廷袁世凯刺杀。何遂悲愤至极，毅然决然率领第六镇部分官兵宣布起义，被推为燕晋联军副都督。辛亥革命后，何遂见山西无可作为，便于民国2年（1913）赴日本考察军事。民国4年（1915）回国，应黎元洪的邀请，到陆军大学任战术教官，与李济深共事，彼此相交默契。云南“护国战争”发动后，他潜往大同，策动晋北镇守使孔庚通电反袁，并由他起草电文。然孔庚被阎锡山拘捕，何遂则由山西警备司令胡谦“陪送”出境。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主持的北京政府派何遂和沈鸿烈、郑桓等为代表，赴欧洲观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到过法、比前线，并去过英、美等国。归国后，著成《欧洲观战记》一书。民国6年（1917）7月，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何遂南下加盟，任



何遂

靖闽军司令。随即奉命回闽策划打倒北洋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何遂回福州后，设秘密机关于台江太原街一个日本洋行内，密谋炸死李厚基。不料事泄，遭军警追捕而避入日本领事馆，乃化装潜逃入沪，再次东渡日本。民国8年（1919）回国。民国9年（1920）何遂经孙岳引见，担任曹琨军官教导团教育长。旋任孙部参谋长。民国13年（1924）冯玉祥联合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琨，建立国民军，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何遂始终参与筹划和行动。国民军时期，何遂任第三军参谋长、第四师师长，还担任北京政府的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国民军中聘有几十名苏联顾问，他开始接触唯物史观，思想上受社会主义理论影响。

北伐战争期间何遂赋闲于杭州，受蒋介石委托到河南去，利用旧部关系，运动直系军阀和曾属国民军系统的军人倒戈，响应北伐。民国17年（1928）春应李济深的邀请，到广州任李的总参议。同年5月，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代理校长，称

“代校务”。民国18年（1929）底，因蒋介石已在南京另设军校，他愤而辞职，到西安任十七路军总参议。

2. 身先士卒奔赴抗日前线，英勇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何遂大声疾呼国人救亡图存。民国21年（1932）春，何遂在北平，与朱庆澜等一起组织“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他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以极大的热情，四处奔走呼号，募集捐款，支援前线。不惜毁家纾难，捐款大洋4万元，并多次到热河前线慰劳抗日义勇军。目睹热河前线抗日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热血沸腾，积极筹划军歌创作以鼓舞士气。将士高歌之《义勇军进行曲》，即在其策划推动下经田汉、聂耳作词、作曲而广泛流传。

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何遂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真正从民族大义出发，爱国抗日，富有政治远见。他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他热诚拥护枪口一致对外，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秋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遂，得以结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何遂设家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借机告之，代表团驻地必须加强警卫，然而缺少枪支装备。他立即叫两个儿子把家中的4支长枪和两支手枪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后，程潜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何遂任该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曾陪周恩来同车由河南前线奔赴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数日行程中两人推心置腹地交谈，何遂表示深获教益。在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何遂晋见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促膝长谈。他利用同阎锡山之旧部关系协调八路军与阎之矛盾。还通过当时在军令部任次长的林蔚疏通，尽其可能为八路军增加若干军饷。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叶剑英曾亲自请何遂向山西有关军政人士说明共产党抗日救国宗旨，要求制止摩擦。何遂

随即向山西驻渝办事处处长孙焕庸等官员做了工作，间接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1940年夏，因淮、沪盐被日军控制，陕中、豫西地区食盐供应紧张，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想从陕甘宁边区运花马池盐接济。经何遂介绍，缪在重庆海关宴请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和博古。席间谈妥，由何遂的长子以盐务总局代表身份赴边区洽办，以花马池盐换取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得以较好解决，客观上有利于冲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何遂收到三子何康转来的董必武一封信，得悉八路军办事处经济困难，他不顾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亲自驱车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见到董必武，表示了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不满，并面交一笔现款。后来，董必武、叶剑英赠送他延安生产的毛毯、衣料作答，他一直珍藏在家中。

在何家中，虽然何遂是国民党，但五个孩子有四个都是共产党员，并利用何遂在国民党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努力从事地下党工作，获取了大量珍贵情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坚持抗日的何遂便亲自将自己年轻的子女托付给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赴延安参加革命。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下半生坚决跟随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坚持抗日的决心。对小儿子何康，何遂却舍不得放走。1939年深受革命影响的何康也要求去延安学习，何遂便对周恩来说：“我有两个儿子去延安了，老三再走，我也呆不下去了。”何康虽没去延安，但周恩来却把何康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这使何康成了一名地下党员，并任重庆南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时年仅16岁。何康的妹妹何嘉也是共产党员，党组织还多次安排她利用父女的特殊关系，协助何遂工作，为党获取情报、为国共合作奔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争取并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嘉曾经回忆，1949年她作为地下党员，和父亲何遂共同为党工作。在这一年里，父女俩人三次会见白崇禧，拜会李宗仁，动员他们和谈息兵，避免生灵涂炭。他们既是父女，又是同生死的战友。

何遂最为传奇的经历是策反“台湾国防部参

谋次长”吴石。何遂和吴石曾经是师生关系，又是生死之交，吴石是深受何遂影响并通过他和共产党建立直接关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大业，最终壮烈牺牲的。毛主席称之为“密使一号”，这也是我党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地下工作英雄传奇。

四、林亨元与双虹小学

林亨元，曾用名林觉生。男，汉族，1909年1月生，福建福州人。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30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政治系，系沈钧儒先生门生。后在武汉、重庆、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曾任中央日报社资料室代主任、时事新报馆经理。建国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民事审判庭副庭长、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民盟第四屆中央委员、第五屆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12月1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林亨元系双虹小学首任校长。福州双虹小学（后改名为沧洲小学）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我党在福州的重要活动据点，许多革命先辈，如林亨元、郑太初、王助、王一平、陈一平、卢茅初、郑挺、顾凤、李铁、林白等同志都曾在这个学校开展活动。台江书院教育源远流长。当年陈璧因丁忧回榕期间创办苍霞精舍（即苍霞书院），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璧、孙葆缙、林纾等人而今苍霞洲46号林纾旧居创办“苍霞精舍”，为绅办新式学堂，系宣统元年（1909）官府在吉祥山创办的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的前身。林纾在苍霞精舍任汉文总教习。1882年林纾携母及妻女，迁往福州闽江边的苍霞洲新居，在这里，他度过了带给他许多感慨的15年。林纾的许多译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这个期间，他接触到许多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看到国内旧式教育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病，深感实施教育改革之急迫。1897年夏，林纾中年丧偶，情绪忧郁。经福州船政局道员魏瀚介绍，认识了船政学堂法文教习王寿昌。王得



林亨元(右一)

知林纾博学善文，邀请与其合译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因林纾不懂外文，遂由王寿昌捧读原著，口述内容，林纾则边听边写，用流畅文笔加以润色译出，经常是“耳受笔追，声已笔止”。历经数月译作成篇，题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自署笔名冷红生，王寿昌则署为晓斋主人，并由魏瀚出资，请福州吴玉田刊刻，于1899年2月，出版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翻译小说——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当他1897年春，再次迁往下杭街天王巷时，与当时回闽奔丧的邮传部尚书陈璧，农工商部员外郎力钧，奉天河北道孙葆缙等旧友合作，利用他苍霞洲的旧居创办“苍霞精舍”。这是与旧私塾完全不同的一所绅办新式学堂。教学内容除汉文外，还开设了数学、英文、历史、地理、时务等新式课程。监督任佩珊，林纾任汉文总教习，亲自给学生讲授《毛诗》《史记》等。清朝戊戌变法之前，在东南一隅的福州，能够由民间兴办这种洋式学堂，无疑需要巨大的改革勇气。“苍霞精舍”的建立及其影响的辐射，不仅对福建，乃至对当时全国教育制度的改革，都发挥了启蒙和推动的作用。林纾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苍霞精舍后轩记》，全文仅五六百字，把“苍霞精舍”的

位置环境、成立由来、教学经过，以及对故人旧物的怀念，都跃然眼前。这也是林纾所办“苍霞精舍”，至今留下的惟一珍贵史料。还有遍布全区城乡的众多书院。较为著名的有双虹书院（今双虹小学沿用其名称）。嘉庆十二年诸生登廊、登广重修，其后荒废。清朝中叶，沧洲庵设双虹书院。清末，横街池墩设玉融书院，右有武庙，左为一真庵（后改金斗小学，今为台江区少年宫）。实际上早在五代后梁龙德二年（922），在南禅寺旁即设有鹿鸣书院。此后至清代中叶，台江地区教育形式以书院、社学、私塾为主。“五口通商”之后，外国人开始在台江地区办学，最早的有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办的保福山男女学堂、铺前顶学堂等，均带有义学性质，传播西方文化。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宣统末年（1911），一些有识之士，兴起办学热潮，官府也开办职业学校和小学。始者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纾等人在苍霞洲兴办的苍霞精舍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福建农桑总局在原“耿王庄”（今南公园）内兴办的浙股、粤股蚕务学堂。继之有海防厅办的厅立小学堂；私人办的南台、开智、铺前、琼河、榕南、商立、万寿等小学堂；基督教青年会办的青年会书院；官府办的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福建教育总会办的两所公立小学，形成教会办学、私人办学、官府办学并存的局面。但民间私塾仍较普遍。到清末，辖内私塾有60余所。民国初，私人办学仍方兴未艾，且出现女子学校。其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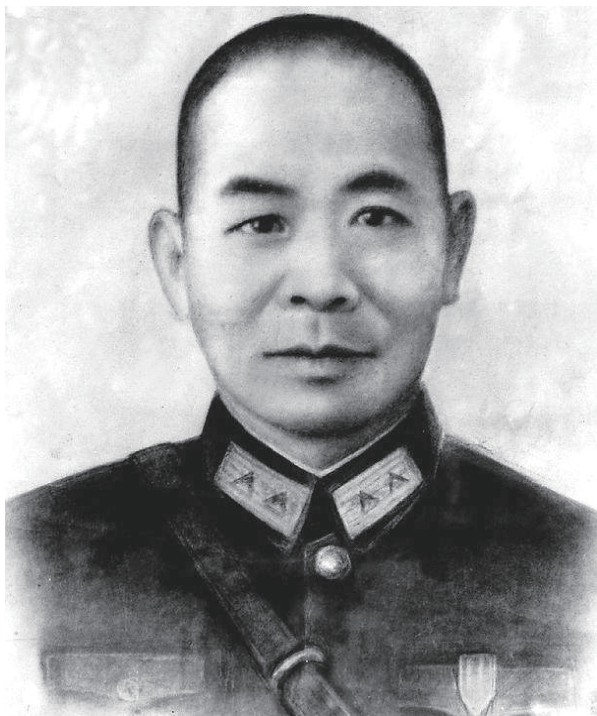


双虹小学

台江女子小学校以及彬社、龙潭、达道、琼水、城南、沧洲小学校等。民国22年（1933），政府着力普及民众教育，在台江地区设有斗南境、吉祥民众学校和洋头口中心民众学校计10所。教会办、私人办的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屡有出现。民国26年，政府在吉祥山兴办省立医务专科学校，后改名福建省立医学院，是当时台江地区内唯一的高等学府。至民国37年（1948）台江地区内有幼儿园5班，小学25所（其中台江区13所、112个班、学生8144人；小桥区12所，学生4464人），普通中学4所（私立文山女子学校、私立开智中学、私立福商中学、私立青年会商业职业学校附设普通初中部），职业学校1所（私立青年会商业职业学校），高等学校1所（省立医学院）。民国38年（1949）增设私立四端中学1所，直至福州解放。总之，台江传统文化深厚且教育兴盛，对林亨元影响至深。

五、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密使一号”吴石

吴石（1894—1950），原名萃文，字虞薰，福建省闽侯县（今福州市）螺洲乡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处长，后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192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抗战中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1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底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去台湾，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台被捕叛变而被秘密逮捕；同年6月10日，与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在台北遇害。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后至日本深造，学习军事。学成回国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其政治背景属于国民党“桂系”。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



吴石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任职。吴仲禧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明吴仲禧乃多年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作了报告。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兵临南京城下。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新中国。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随即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可见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其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了解放军。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军敲响了警钟。解放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华东局台

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即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蔡孝乾叛变，供出了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被押马场町刑场枪决。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供出了吴石。蒋介石得悉，非常震怒。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去向，吴石亦彻底暴露。随即朱谌之被捕解台。由于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加上吴石在军界有众多朋友门生，台湾当局需要给海内外明确交待。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此案最后枪决了6人，与吴石和朱谌之一起就义的还有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随员聂曦上校等人。吴石没有辜负何遂等战友对他的期望，以自己对中国民族的解放事业的赤胆忠心，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的英雄凯歌，在新中国犹如旭日冉冉升起之时，义无反顾地和自己的同志们走向刑场，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征战的路上，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怀念。

综上所述，如今以何遂为主，包括左宗棠、沈钧儒、林亨元、吴石共计五个著名历史人物的感人事迹，对于继承革命传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均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石器时代、闽族、闽越族在 闽都地区遗址述略

◇黄荣春

闽都文化有其源头、孕育期、成形期，历经石器时代、闽族、闽越族时期。现把石器时代、闽族、闽越族在闽都地区遗址述略于下：

一、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考古学名称，是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当时以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从人类出现直到铜器时代开始为止，历时二百万年。在人类历史上属于原始社会时期。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可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闽都地区今已发现旧石器时和新石器时代两种文化遗址。

1.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从距今约300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止。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相当于人类从原始群到母系氏族公社出现的阶段。地质时代属于上新世晚期更新世。福建省发现最早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三明万寿岩山灵峰洞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及被人类宰杀的动物化石，距今18万年左右。闽都地区已在平潭的白云山、五星村、官树村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3万多年至1万多年；在宁德霍童溪沿岸的芦坪岗遗址、瓦窑岗遗址出土距今1万多年的



新店古城出土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刮削器)

打制石器。2000年8月8日，在新店古城外城出土数件打制石器，其中1件刮削器长10厘米，宽8厘米，横脊厚4.5厘米。据有关专家鉴定：这些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晚期遗存，距今已有1万多年（有说距今2万多年），这是福州市区发现最早的旧石器，说明新店古城至少在距今1万多年已有人类在此活动。

2. 新石器时代 是继旧石器时代之后，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它是考古学分



平潭壳丘头遗址

期中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距今1万年—4千年（有说为8、9千年至4千年左右）。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磨制石器，能制陶和纺织。已发明农业和畜牧，生活资料有较可靠的来源，开始定居生活。

闽都地区已发现30多处新石时代遗址。闽都先民创造了壳丘头、昙石山等文化，含有地域性和海洋文化的特色。最典型的是马祖亮岛遗址、平潭壳丘头遗址、闽侯昙石山遗址，闽侯大坪顶山遗址独具特色。

马祖亮岛遗址，亮岛位于福建省马祖列岛北竿与东引之间，属福建省连江县（现为台湾当局管辖并实行军事管制），长1400米，宽250米，四周峭壁陡峻，地势险要。2011年9月，出土一具屈肢葬的人骨骨骸，经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8320—8060年的人类遗骸，命名“亮岛人”1号，同时出土骨器、石器与陶片等常见的新石器时代器物。2012年7月又发现“亮岛人”2号，测定为距今7590至7530年。（引自田欣云《国际使节学者团明登马祖亮岛勘查》及有关资料）

壳丘头遗址，在平潭平原镇桃花寨村东南，距今7450—5890年，是迄今福州地区已发现最早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1958年发现，遗址面积约3200平方米。1985年福建省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772平方米。发现有新石器时代贝壳堆积和墓葬，出土文化遗产物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种。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玉器、贝器、陶器等文化遗产物，石器多为磨制，磨制石器有石

斧、石锛。骨器有凿、匕、镞、锥等，系用鹿、野猪跨骨、肢骨制成。陶纺轮分别用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和夹砂灰陶制成。生活用器主要有釜、罐、碗、盘豆等陶器，大量为夹砂陶片，少量为泥质陶。纹饰有拍印的麻点纹、贝壳压印的贝齿纹，以及戳点纹、多线平行划纹、绳纹、条纹。

平潭壳丘头的先民从事渔猎等生产活动，即以捞鱼、采贝、狩猎为主的原始经济生活，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海洋性文化。壳丘头类型是闽江下游地区已发现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国际考古学界和中国考古学界一些学者把壳丘头当作南岛语族最早的源头。（摘录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七期及有关资料。）

闽侯大坪顶山遗址，在洋里乡大坪顶山。2016年3月，昙石山遗址博物馆进行“闽江下游史前遗址调查”时发现，该遗址具有明显的文化堆积，发现有彩陶釜、弓背锛等文化遗产物。该遗址还发现了少量碳化的稻谷颗粒，经检测距今约7500年，是我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颗粒。这些遗物都为福建史前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该遗址的发现，说明在距今约7500年前，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原始聚落已出现，农耕文明得到初步发展，这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福建沿海地区最早的文化聚落遗址之一。（摘录2017年4月19日福州晚报记者陈木易、通讯员林若野《闽侯洋里乡一史前遗址发现我省最早的



大坪顶山出土的碳化稻谷（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图）



昙石山遗址墓葬 曾江/摄

水稻颗粒7500年前闽沿海就出现文化聚落》)

闽侯昙石山遗址，昙石山文化因闽侯昙石山遗址而得名。昙石山遗址是1954年修筑闽江堤坝取土时在甘蔗镇昙石村的昙石山发现的，现存遗址面积2万多平方米，文化内涵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兼有青铜时代遗存，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考古工作者于1954—1997年先后对昙石山文化遗址进行8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揭开76座墓葬、数十个灰坑、5座陶窑、2条壕沟。遗址分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下层出土的石器有石铤、石镞、石凿等，石器磨制粗糙，器身多残存打制痕迹。陶器多为手制，部分器物口沿有轮修痕迹。质地以红陶为多数，少数为灰黑陶。较典型器物有宽沿浑腹圜底釜、小口高领罐、宽平沿盆、敛口钵、直口壶等。纹饰有贝印的堆纹、短线竖蓝纹、圆圈纹、重圈纹、粗绳纹。墓葬均为土坑单人一次葬，无葬具，方向多为东北向，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

第七次考古发掘中，在中层底部发现新石器时代的5座窑址，出土有夹砂粗红陶、泥质红陶、泥质橙黄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片，说明当时制陶业有一定的规模。在昙石山遗址中层及

附近的庄边山遗址下层均发现有一定规模的公共墓地，墓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不见葬具，以仰身直肢单人一次葬为主，少量为仰身或侧身屈肢葬。在小孩墓葬中其遗骸多缺指骨和足骨，属“割体葬仪”埋葬习俗。个别墓葬中还发现上颌两个口齿生前缺少，疑当时有拔牙风俗。墓中的随葬品一般为6、7件，多者达20多件。中层的晚期墓葬中还出现成年的男女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居右，女性侧身屈肢左并依附于男性身旁，当时处于父权制时代。

上层出土有石器、骨器、陶器。陶器以印纹硬陶最多，还有少量粗砂灰陶和硬质橙黄陶。印纹硬陶火候较高，硬度较大，击之发声清脆，皆为灰色。纹饰有篮纹、回纹、云雷纹、复线纹、横直交错纹、弦纹，此外还有彩绘几何图案硬陶片。器物主在要有敛口鼓腹绳纹夹砂灰陶罐、小口鼓腹平底篦纹泥质灰硬陶罐、敞口直腹回纹灰硬陶杯、直口短颈鼓腹泥质灰硬陶壶、敛口外折沿彩绘盆、大口平折沿彩绘盆等。石器大多通体磨光，有石铤、石镞、石矛、石环等。此外还发现夯土祭台和殉狗坑，在商周墓中出土2件玉玦。

第8次考古发掘中掘出一条新石器时代壕沟

和一条商周时代壕沟，2条壕沟的发现，为福州城市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郑国珍《闽江下游原始居民点的形成及福州早期城市的产生》提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于商周时期位处闽江下游的昙石山原始居民点遗址中，就可见到具有一定的按生活、生产需要的简单功能分区——生与死、生产与生活的区别。在遗址范围内，居住地与墓葬区分离，墓葬区的南侧是烧制陶器的窑址；两条分属于‘昙石山文化时期’和‘黄土仑类时期’的壕沟，起到了原始居民点周边的设防作用，是福建迄今发现最早的防御设施，孕育着早期城市功能的萌芽。”

壕沟是原始居民的设防，两条壕沟已证明其孕育着闽都早期城市萌芽，也是孕育都城文化的萌芽。昙石山属闽都地区，从而说明今福州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交，已孕育城市文化，即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朝已孕育着闽都文化。

昙石山遗址有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下层与壳丘头文化有着承袭关系，其年代的上限与壳丘头文化的下限相御接；中层出土的兽骨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 3905 ± 90 年；其下、中层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500—4000年，考古界把昙云山文化遗址的中下层称为昙石山文化。上层的年代尚有争议，多数专家认为属青铜器时代，少数认为属“新石器时代末期”。关于昙石山文化的内涵，多数专家认为遗址的下层、中层才属于昙石山文化，而曾凡先生等认为“三层互有联系而持续发展的，都应属于昙石山文化的范畴”。曾凡先生的看法颇有道理，把一个互相联系的三层遗址，人为把其下、中层的文化层命名为一种文化，而排斥其上层的文化层，这种排斥法难于使人信服。

昙石山文化是以贝丘堆积为主，集中分布于以闽江下游为中心的福建东南部沿海一带，连接闽台两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研究闽台古文化渊源，亦有着重要意义。2001年，昙石山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摘录林公务《福建境内史前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区

系类形》，《福建历史文化博物馆研究》第73页；曾凡《从考古发现谈福建史前社会的发展问题》，《福建历史文化博物馆研究》第53、54页，及有关资料）

二、闽族

闽族在闽越族形成之前。《周礼·夏官·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郑玄注：“闽、蛮之别也，……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数也。”贾公彦疏：“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周礼·秋官·司寇》：“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这是史书第一次记载“七闽”和“闽”。《周礼·秋官》又曰：“闽隶，百有二十人。”“闽隶：掌役畜、养鸟，而阜蓄教扰之”。

闽是作为方国、地域和族民的总称，是受周王朝统辖和管理的独立大族。闽与周王朝的关系是地方部族与或邦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闽方国不仅要向周朝廷朝觐、受谕，还要向朝廷提供隶役，以“掌役畜、养鸟”等工作。《读史方輿纪要》等书记载闽在“周为七闽地”。闽治在今福州，周的都城在今陕西长安沔河以东；闽是周的方国和族属之一，受周王朝的统辖和管理，它的财用、谷畜等经济情况，利害得失，全在奴隶制王国的掌握之中。

闽族是中国东南地区最早的土著民族。闽族是七闽(闽)的族称，是奴隶制社会期间形成的一个民族，源于原始先民，形成于夏朝，发展于商周，消亡于战国中晚期，历时1600年以上。其族民居住地在今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东北部、



黄土仑遗址出土的印纹硬陶双耳罐与把杯

广东东部等地。今福州是闽族主要聚居区。闽族有自己的文化，即闽族文化。闽族文化是从石器时代发展而来，闽族人在社会活动中遗留大批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址和遗物。闽族文化内涵是多方面的，除精细的磨制石器 and 青铜器以及已出现干栏式建筑外，主要表现在陶器方面：陶器是以印纹陶文化为代表。印纹陶文化是以陶器表面拍印几何形花纹为主要特征，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流行于青铜时代（相当中原的商周时期），延长至秦汉，是中国东南地区的一种古代文化的名称。分布在今广东、台湾、福建、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等地，主要集中在闽、台两省及浙江南部、江西东北部和广东东部。这个分布区被称为“几何印纹硬陶闽台区系”，或称为“闽-浙南-粤东区系”。

闽族文化遗址，主要是指青铜器时代闽族人在其居住地遗存的文化遗址。闽都地区迄今已发现黄土仑等300多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最典型是黄土仑遗址。

黄土仑遗址，在闽侯县鸿尾乡石佛村南部，面积约5000平方米。1974-1978年进行多次考古发掘，文化堆积分三层，第三层为商周文化层。发现一处红烧土残迹，红烧土残迹是不规则四方形，长2.25米，宽1.52米，红烧土内出土有残木椿、木炭，土面发现5个直径4.5-5厘米，深5-21厘米的圆形柱洞。清理19座竖穴式土坑墓，出土近200件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

出土较完整或可复原的陶器145件。陶器有豆、杯、罐、壶、尊、盂、勺、钵、釜、簋、鬲、虎子形器、甗形器、鼓、纺轮、网坠等16种。制作方法以轮制为主，少量为手制或模制。以火候较高、有少量细砂的泥质灰色几何形印纹硬陶为主，刻划纹硬陶次之，还有少量的泥质红陶和细砂红陶。陶色有浅灰、深灰、黑灰等。纹饰有云雷纹、方格纹、回形纹、三角折线纹、曲尺纹、平行斜线纹等。纹饰制作采用拍印、刻印、锥刻、镂孔、凸棱、出纽，以及装饰附加堆贴。陶器出现云雷纹、回纹及广口折腹、圈凹底等风格是受夏商青铜文化影响，虎子形器、甗形器是商代常

见的器形。这批陶器除表现出强烈仿铜作风外，还具有品种丰富、制作精美、造型独特等鲜明地方特色。黄土仑遗址代表福建闽江下游一处受中原青铜文化影响而具浓厚地方色彩的文化遗存。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验室对第三层出土的木炭进行碳十四测定，其年代距今3250年 $\pm$ 150年，即相当于商代晚期遗存。遗址被考古界命名为“黄土仑文化”。

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多者21件，少者4件，个别没随葬器物。从随葬品出土的多寡，可看出处于奴隶制社会的闽族成员所拥有的财产情况。（图文引自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1984年第1期及有关资料。）

三、闽越族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的共同体。也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族体。民族同其它事物一样，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闽族源于原始先民，形成于夏朝，发展于商周，消亡于战国中晚期。闽族消亡后，取而代之是闽越族。促使闽族消亡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越族迁入七闽地区。

越人迁移闽族地区主要有三次：

1. 位于今江西东北部的于（干）越国被吴灭亡，部分于越族人逃入较安定的闽族聚居地，于越人与闽族人相处在七闽之地。福州市内于山，相传于越族人居此故名。

2.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越国夫椒之地打败越王勾践的军队，并派重兵把勾践围困于会稽，勾践被迫“请为臣，妻为妾”。由于越国战败，国破家亡，为逃避战乱，大批越族人南逃到与该国相邻的七闽。

3. 越王勾践虽经“卧薪尝胆”，最后灭掉吴国，但到越王无疆时国力已衰弱，却“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越国出兵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



新店古城出土的战国晚期冶铁炉底座



新店古城出土的战晚期铁渣、陶范、炉膛残块

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于楚”。连横《台湾通史》记载：“楚灭越，越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明《八闽通志·地理·长乐县》：“越王山，在上十一都。高一里，周围三十里。越王勾践七世孙无疆与楚战不利，子弟或为王，或为君，散居南海上，此其一也。”

越国灭亡，贵族与平民大量逃往七闽地域（闽族居住地）。南逃到闽族地区的勾践后裔在江南沿海或岛屿实行武装割据，进而争夺原七闽地盘，他们各据一方，“或为王，或为君”，其时的七闽之地名义上臣服于楚，实际上已逐渐被南下的越王族征服。

七闽的土著民族（闽族）与南下的越族同处一个地域，越人把先进的吴越文化，和先进的纺织、冶炼、种植技术带到七闽，促进七闽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两个民族相处或混居同一地区，落后的民族文化必然被先进的民族文化所同化。两

个民族成员之间的通婚，也使民族之间的血缘结构起了变化。南下的越人与土著闽人经过数十、上百年的相处、通婚，终于使闽族与越族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闽越族。福州民间至今传承着闽越国习俗，如福州等地方言把女人称为“诸娘”（无诸女），把男人称为“唐补”。陈衍《福建通志·方言》：“男子曰唐补人……女呼诸娘。案：当谓无诸国之娘。”黄葆成《蕉香馆诗》：“福州称女子曰诸娘，诸娘沿无诸妇人之称。”相传唐末五代时，王审知率兵攻入福州，因战乱，福州男人多战死或被杀，王审知官兵又无妻。于是王审知下命，把其官兵与福州女进行配婚。配婚时，先把男人和女人各装入麻袋，然后把男女进行胡乱配对，并用一根红绳把两麻袋内的男女四脚实施捆绑，经红绳捆绑在一起的男女就正式成为夫妻。当打开麻袋时，出现有少女配老翁，或少男配老太婆。少女配老翁者，少女称丈夫为“老公”，少男配老太婆者，少男称妻子为“老婆”。因当地女人是闽越王无诸时代闽越族人的后裔，故被称为“无诸女”或“诸娘”。男人是王审知带来的官兵，故称“唐补”。福州民间至今男女订婚时，男方要送女方家一对双脚捆绑红绳的公鸡和母鸡，以示男女双方已被红绳捆扎在一起，正式订为夫妻。

闽越族是闽族与越族融合的民族，也是百越族的一支，闽越族居住在原七闽地。秦统一中国设闽中郡，郡的辖地基本是原七闽地。《辞海》（1999年版）曰：“闽越，古越人一支。秦时分布在今福建省境和浙南、赣东北部分地区及福建沿



新店古城战国晚期东城墙遗址

海岛屿，台湾也有闽越人聚居。”唐·杜佑《通典》在潮州郡条载“潮州亦古闽越地”。宋《太平寰宇记》也有相同记载。《舆地广记·广南东路》记载：“潮州，春秋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其书又曰：“梅州春秋为七闽地，战国属越。”清同治《广信府志》卷一〇一《地理沿革》：“铅山县，春秋时属闽越，秦属闽中郡”。故今广东的东部、江西东北部、台湾亦为闽越族居住地。

福州是闽族主要的聚居地，《山海经》云“闽在海中”。林汀水《城村古城不是闽越国城》亦称“按《山海经》既谓‘闽在海中’，是时之闽越早期活动中心，主要应在沿海一带，而谓闽中山是在海中，就从当时的地貌形态看，更是早期的闽越人，其主要的活动中心应在今之福州。因为当时的福州尚未筑其东、西湖，二湖的湖区还为海湾之地，福州仍属歧海的地形”。

闽越文化，其核心是闽越国都城文化。闽越国始建立于战国晚期，其疆域最强盛时以今福建全境为主，北至浙江南部，南至广东东部，西至江西东北部，台湾亦为辖地。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



龙凤呈祥万岁瓦当



万岁未央瓦当



万岁瓦当



常乐万岁瓦当

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无诸在秦并天下后被废为君长一事，说明无诸在战国晚期已是闽越王了。假如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的前一年无诸建立闽越国并称王，至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闽越国灭亡，闽越国在世达112年以上。梁克



冶山北侧财政厅工地汉代建筑遗址



屏山遗址出土的汉代铁锚

家《三山志》曰：“闽粤王无诸……知在周世为王矣。”周朝灭亡于公元前256年，闽越国亡于公元前110年，《三山志》之说若属实，闽越国在世达146年以上。

闽越国都城在东冶（今福州），福州已发现的闽越国遗址主要有新店古城遗址、屏山汉代宫殿遗址、牛头山汉代宫殿遗址。

新店古城于1985年5月由笔者发现，分内城和外城，占地面积31万以上平方米，自1996年至2018年进行9次考古发掘，在城内出土距今1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发现战国时期冶铁炉遗迹，出土5块炉底石基座、50多件炉膛残块、一批陶范、1000多块铁渣，伴随出土有泥质陶罐和夹砂陶豆等器物，出土战国时期冶铁炉遗存为“东冶”地名提供实物资料。在内城护城河最底部仅出土战国晚期及之前陶片，在内城的东、西、北城城墙内仅发现战国晚期及之前陶片，在东城区的夯土内出土二种木炭，经美国贝塔实验室碳14测定：一种距今 2770 ± 30 年，一种距今 2410 ± 30 年。外城城墙夯土内出土汉初陶片，地基砂层中出土战国时期的陶范和铁渣。护城河最底部陶片年代就是建城年代，早期城墙出土的最迟器物的年代就是城墙建造的年代，为此新店古城内城始建于战国晚期，外城扩建于汉初。新

店古城应是闽越王无诸在战国晚期自立为王时建造，汉初复立为闽越王时加以扩建的城池；由于东城区夯土内出土距今 2410 ± 30 年的木炭，为此不排除无诸的先辈开始建城的可能性。（二种木炭系2019年由市考古队发掘出土并送美国贝塔实验室进行碳14测定）

屏山宫殿遗址于1991年11月由欧潭生和郑国珍对省建设银行工地考古发现时发现。屏山汉代建筑遗址南从冶山南侧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宿舍建筑工地，北至华林寺南侧约80米的农业发展交流中心工地；东从省二建工程建筑总公司综合大楼工地，西至西湖东侧约30米的湖滨路大会堂工地，占地20多万平方米。宫殿核心区南自欧冶池边省财政厅工地，北至省政府南侧的地铁工地，其规模浩大，建筑构件精美，体现闽越国进入最繁华昌盛及灭亡时期。

从建筑规模、形制，文字瓦当等可看出几个问题：

1.“万岁”“万岁未央”“万岁常乐”文字瓦当的出土，以及大型建筑遗址的发现，说明其地为汉代宫殿遗址。

2.万岁瓦当及建筑遗存有被火烧痕迹，证明其宫殿毁于大火，即在汉武帝灭亡越国时被汉兵烧毁。

3.宫殿使用“万岁未央”、“长乐未央”瓦当，



牛头山汉代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说明此宫殿是仿照或慕名汉长安未央宫和长乐宫建造的。未央宫是西汉帝国的大朝正殿，建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年），由刘邦重臣萧何监造，在秦章台的基础上修建而成。长乐宫于汉高帝五年（前202年）九月至七年（前200年）二月，由萧何主持在秦兴乐宫基础上营修而成。未央宫和长乐宫均建成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从而证明已发现的屏山汉代宫殿建于汉高祖七年之后，不是战国晚期的遗存。

4.发掘证明屏山宫殿及其附属建筑规模浩大，占地20多万平方米。无诸或其子当政的文帝元年（前179年），南越王赵佗看不起闽越国，说“闽越千人众，号称王”。无诸死后的“后数世”，到了闽越王郢及其弟东越王余善时，拥有“甲卒不下数十万”，才有可能在福州西郊牛头山和屏山进行大规模的建设。

5.瓦当初为半圆形，到了秦汉才使用带有文字的圆形瓦当。西汉中期圆形瓦当的特点是当面正中饰乳钉纹（乳头状），乳钉纹外置圆圈，圈外篆书文字。屏山宫殿遗址出土瓦当的当面正中饰乳钉纹，圆圈外篆文“万岁”、“万岁常乐”、“万岁未央”等文字，符合西汉中期瓦当的特点。

6.用万岁文字瓦当来建宫殿是僭越礼制的，不只是所谓“吉祥”用语。《辞海》记载：“万岁，本为臣下对君主的祝贺之辞。《事物纪原》卷一：‘……盖七国时，众所喜庆于君者，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闽越国诸王中有闽越王郢反汉被杀，又有东越王余善刻“武帝”玺自立，建“万岁未央”宫，在闽北建六城以拒汉兵，公开反抗汉朝廷；故闽越王郢和东越王余善敢于僭越礼制，用“万岁”瓦当建造宫殿。

7.屏山一带汉代宫殿遗址出土的“万岁”瓦当、板瓦、筒瓦、铺地砖，与武夷山汉城出土的“万岁”瓦当、板瓦、筒瓦和铺地砖进行对照比较，两者形制、规格相同，为同一历史时期的建筑遗存，但屏山宫殿略早于武夷山汉城。

8.发现汉代码头，出土重65斤、通长51厘

米、通宽52厘米的汉代船上使用的铁锚，证实东冶港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之一。

9.屏山一带虽经10多次考古发掘，不但没有发现战国晚期建筑遗址，也没发汉代城墙，且已发现所有大型建筑的上限不会超过闽越王郢时期。从闽越王郢反汉、余善杀郢而威行于国，国民多属，并自立为王，无诸之孙越繇王丑不能控制局势，汉武帝以余善诛郢之功，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东冶的历史演变，以及遗址分上下两期的建筑构件（上层出土“万岁未央”瓦当，下层出土“万岁常乐”瓦当）推断：屏山一带上层的大型宫殿应是余善建造的，下层建筑遗迹应是闽越王郢建造的宫殿遗址。王应山《闽都记》等方志关于“赞福庙（明德赞福王庙），在府治之西。汉闽越王郢开州西大路，积土成丘，后人即其地立庙祀之”的记载，屏山至冶山一带可能始开发于闽越王郢时期，此事有待探讨。

牛头山汉代遗址，在福州西郊洪山镇打铁桥村北侧，海拔25米，位于新店古城西南侧，距新



牛头山汉陶水管及封口板瓦

店古城约7公里，距其东侧的冶山遗址约3公里。2001年5月，解放军某部在牛头山北侧施工时，发现一处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大型汉代建筑遗址。东部剖面发现一段外口径32厘米的汉代陶制水管，水管外表饰粗绳纹，水管延伸到山巅部队围墙内。

2001年8-12月，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考古队、武夷山汉城考古队联合对牛头山西北部一处占地近500平方米的空地进行考古发掘，第6层为汉代地层，堆积大量的汉代瓦件。出土有泥陶质板瓦、筒瓦、瓦当，以及陶水管，出土数十件“万岁”瓦当残块，瓦当为陶质，呈黄色，正中饰一个圆形乳钉，周以圆圈，上部饰云纹，左侧饰一个“万”字，右侧饰一个“岁”字，篆书，阳刻。

发掘区发现31个柱洞，柱洞口径30-50厘米，深40-70厘米。有的柱洞残存被火烧留下木炭。同时又发现一条通往山顶的汉代陶制排水管，水管外表饰绳纹加平行弦纹。其中1件完整陶水管的外径为30.4、厚1.2、尾径24.4、长73.6厘米。管口被一块板瓦封住（陶水管左图）。遗址还出土近400件陶器，还出土铜箭镞、铜镜、铁器。

牛头山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证明牛头山汉代建筑分为早晚二期：

早期是山顶围墙内有早期大型汉代建筑遗址。2条口径30厘米以上的汉代水管分别从东西两山坡通往山顶围墙内，说明山顶围墙内有大型汉代宫殿等建筑遗址。

晚期是山坡有万岁瓦当的宫殿遗址。山坡建宫殿时，将从山顶延伸下来的水管用板瓦封塞，说明此宫殿建造年间明显晚于山顶的宫殿类型的建筑。

牛头山出土有汉代万岁瓦当及大型汉代建筑构件，可肯定其地是闽越国时期的宫殿遗址。但它是谁的宫殿？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闽越王郢的宫殿。牛头山及屏山所处地理位置，符合淮南王刘安对闽越王郢时闽越国都的评论，《汉书·严助传》记载建元六年（前135年）淮南王安上书諫曰，闽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

之中”。

另一种是东越王余善的行宫。早期建在山顶的宫殿类型建筑可能是闽越王郢建造。余善杀其兄闽越王郢之后，废弃山顶旧宫殿，在山坡兴建新宫殿。从遗址出土的万岁瓦当与屏山宫殿出土的万岁瓦当形制相同，当为同一历史时期文物，其新宫殿有可能作为东越王余善行宫。牛头山宫殿之主人是谁之事，若对其山顶进行考古发掘，或能有助解决此疑案。（部分资料自《福建文博》2017年第一期《福州牛头山汉代遗址考古发掘简报》）

无诸在今新店古城村建城，闽越王郢、东越王余善在牛头山和屏山鼓屏路一带建有宫殿。汉武帝派兵灭闽越国时，三处建筑均被汉兵烧毁。汉元封元年（前110年），闽越国灭亡，宫殿等建筑被焚毁，反叛汉朝廷的余善被杀，平叛有功的王侯、将军封官后被迫离开故国，贵族及部分平民被强行迁往江淮间，闽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自汉武帝设东部都尉和东部侯官对闽越故地进行直接统治以来，历经冶县自立、东部侯官从官名转化为县名、东吴对东冶用兵、晋太守严高迁城招抚闽越遗民子孙、两晋南北朝中原人口多次南迁，闽都文化出现新的转折，以土著文化为主体的闽都文化，逐渐转化为以中原汉族文化为主体的闽都文化。

闽都文化有其源头，有一个萌芽、形成、发展、壮大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和融合性。它产生于我国东南的闽江下游和闽东地区，源于旧石器时代，孕育于闽族时期，形成于闽越国都城期间，恢复发展于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壮大于唐宋元明清，发扬光大于近现代和当代。根据宋梁克家《三山志》和明王应山《闽都记》记载，原福州八县五区和宁德九县历史上都是福州辖区，闽都文化研究范围应包含原福州地望。

注释：

①②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④林汀水《城村古城不是闽越国城》，《冶城历史与福州城市考古论文集》第14页。

天工再续：沈绍安漆艺

◇林丽钦

中国是漆艺的原乡。杭州萧山跨湖桥出土的漆弓令人惊讶浩叹，弓已断残而漆彩如新，八千年的历劫并未消尽这明艳亮烈天地长久的气魄。华夏先民早就发现一种可以髹饰器物的天然树脂，后人将这能赋予万物恒久典雅质性的神奇之木命名为“漆树”。“漆”字包含了碧入波心的水，深沉纯朴的木与师法造化的人。漆树须历十年方可采漆，三千漆树仅产两斤大漆。“百里千刀一斤漆”道尽大漆之高贵罕有。而髹漆的过程亦繁复漫长耗时数月。漆艺是反机心的，每件器物均手工慢作，成纹天然，独一无二，不可复制，深邃沁人如醉的东方美学与神秘幽渺的中国风韵。

福州自古为漆器重镇，其漆艺发端于唐代，成规模于两宋，更于清代由沈绍安创制脱胎漆器而臻于鼎盛。沈绍安脱胎漆器以独有的“夹纻”工艺制成，轻巧坚牢，瑰丽典雅，光亮如镜，独具特色。朱启钤于《漆书》中记载：“外国人嗜沈绍安手制品，视同古玩，值虽千金，亦无吝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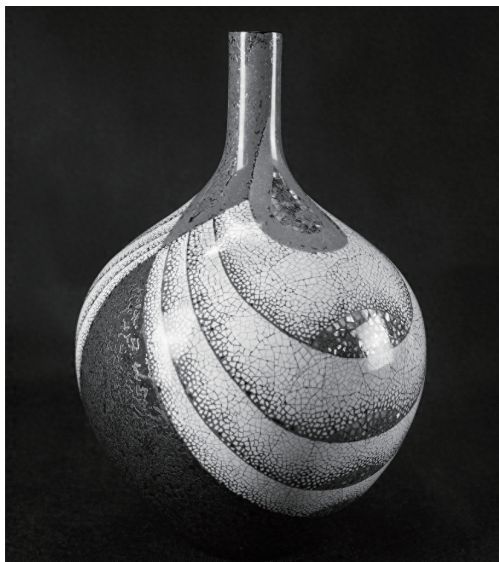
而实际上“夹纻”工艺早在唐代便已失传。六朝佛寺林立，大量佛像的塑造上色都采用汉代的夹纻技法，然而，因唐武宗灭佛毁寺，夹纻技法至此失传。工匠间的手口相授是中国古代漆艺不息传承的重要手段，他们无力从文字上对工艺总结提炼，更难有文人学者为“雕虫小技”写书立说。五代朱遵度的《漆书》早已失传，明代黄成的《髹饰录》也在三四百年的时间里不见踪影，

直到人们在日本蒹葭堂发现它的手写孤本。民国初年，朱启钤请日本友人寄送《髹饰录》钞本并刻板付印200本，后托王世襄解说撰成《修饰录解说》，人们才痛心地从黄成的记载中得知：代表中国传统漆工艺的四项漆艺——汉夹苎、唐平脱、宋素髹、元雕漆，在当时仅存雕漆一类，中国传统漆艺的其他三大代表性工艺在明代中期都已丧失殆尽。

唐武宗之后的几百年，关于夹纻技艺的只言片语也随着历史的尘埃堕入冥漠空无处。而它竟如秦火焚不尽的诗书，躲在一块古寺匾额中默默



小口漆瓶



长口漆瓶

等待合适的机缘能天工再续。

转眼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一个名为沈绍安的侯官(福州)漆匠应邀修复一块沧桑破旧的古寺匾额，他发现这块匾额的金字早已褪色，金字周围的木头也已经残破腐朽，但是用漆灰夏布裱褙的底坯却完好无损，坚固如新。这块金字匾额的制作工艺就是失传已久的“夹纻”。沈绍安想到“夹纻”工艺于制作匾额之外的另一种可能：这一层裱褙坚固持久而又用料轻盈，如果能脱离胎体独立成器，岂不是漆器创制的独门秘技。这意外的灵感宛如神秘的召唤与启示。这块匾额已经等待几世几劫，只待有人勘破天机携带“夹纻”工艺重入尘寰，再与天地大美混而为一。

归家后的沈绍安仿照旧匾多次试验，最终确定用黏土塑造胎体模型，然后在模型外面裱上夏布，涂上青漆，等漆干了之后在事先于底部预留的小孔向胎体内注水，胎体便化成泥水从小孔流出。脱去土模阴干后，再用夏布、生漆层层裱褙，进而髹漆加工上色，成器后，晾至大漆彻底干燥，是为脱胎。简单地说就是依据胎体，在纻布上敷漆，最后脱去胎体，仅留纻布与漆独立成器，脱去泥胎后的漆器轻巧无比，最终得名“脱胎漆器”，沈绍安遂成为沈氏漆艺奠基人，福州脱胎漆器鼻祖。

由于沈绍安的不断改进，这种前所未有的

新型漆工艺在用色上大胆突破了传统的红、黑漆料，加入了黄、绿、蓝、银箔、贴金等技法，纹饰千变万化，绽红迭翠、夕阳落金，美不胜收。金银礼器、琉璃器皿、瓷瓶果盘均可以布胎塑形髹饰，轻如纸、薄如玉、亮似镜，颇受上层精英的欢迎。《闽侯县志》将沈绍安在福州传统脱胎漆器工艺上的功绩概括为：“研究漆术，巧配颜色，创造了脱胎器具和脱胎法，且工艺精致。”其作品在创新和精美上远超当时，沈绍安也被誉为近代中国民间漆器一面最光辉的旗帜。

沈氏漆艺历七代家族传承，脱胎技艺也在传承中不断丰富日臻完善。沈绍安家族第二代沈初朱，在工艺上改一次坭灰为二次坭灰，使脱胎漆器品质更加坚固；第三代沈作霖应用纯金箔炼古铜和黑、朱地筛金方法，进一步丰富漆器装饰；第四代以长房长孙沈允中为首的允字辈兄弟，在胚胎上下功夫，起到了技艺上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五代以沈正镐、沈正恂、沈正悻等为代表人物的正字辈兄弟，分别经营沈绍安“正记”“恂记”“兰记”“恺记”“愉记”“禧记”等店号，其中沈正悻(字幼兰)的“兰记”经过12年的商业竞争，控制了6家沈绍安分号，经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而沈正恂的“恂记”不仅精品迭出，还培养造就了李芝卿、高秀泉、沈幼兰、张锦华等一批漆艺名家。第六代、第七代传人亦经营有方，各有奇巧。沈绍安脱胎漆艺逐步由家族化传



沈记标识

承到品牌化经营，这也让福州脱胎漆器牢牢打下了沈绍安的印记。

而站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浓郁的民族特色与独具的创新工艺足以让沈绍安脱胎漆器为中国艺术代言。从1898年到1904年，沈绍安五代孙沈正镐、沈正恂创作的漆艺作品多次在法国巴黎博览会等世界博览会上荣获金牌等大奖。同年，二人主持的松瓶、桃盘等作品进呈御览，沈正镐、沈正恂亦被授予“四等商勋，五品顶戴”。1910二人又晋升为“一等商勋，四品顶戴”。接着，沈正镐、沈正恂以及沈正愉、沈幼兰等沈氏脱胎漆器世家产品先后选送参加意大利、美国、柏林、伦敦等地的博览会展出，均获大奖，声名远振。由于沈绍安及其家族的出现，福建传统漆艺在清代步入巅峰。

沈家在漆艺的传授上依然秉持家族内部口手相传的方式，并无诉诸文字的漆艺专著。“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家规直至第五代才因有人无心漆艺改业另谋而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沈绍安家族的产业也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沈正恂（幼兰）主动响应“公私合营”政策将“兰记”并入福州脱胎漆器公司（福州第二脱胎漆器厂前身）。1956年，他和沈忠英进入新成立的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福州脱胎漆器为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台湾厅、国宴厅和休息厅等提供了逾千件漆

器，并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出口展览先后达三百多次。福州工艺美术界也都以“沈绍安”三字作为脱胎漆器的正宗代表。沈绍安脱胎漆器就是福州漆器的代名词，其产品质地精良、技法多样、明艳绚丽、漆面照人。郭沫若作诗赞曰：天下谅无双，人间疑独绝。

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浪潮翻涌中，福州第一、第二脱胎漆器厂退出历史舞台。此后的十多年，福州脱胎漆器行业进入了蛰伏期，沈家后人亦在漆艺领域销声匿迹。2006年，沈绍安首创的“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州脱胎漆器始与北京景泰蓝、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工艺美术“三宝”，还被授予“福建老字号”。然而，失去依托的沈绍安脱胎漆器也只剩下名号上的光环。

不久，一个叫林正佳的爱国华侨慧眼独具看到了“沈绍安漆艺”这几个字的价值。要将独有的漆艺文化承传下去，为福建献上一份大礼的起心动念，何尝不像一种冥冥的召唤与牵引，一如乾隆年间沈绍安见到旧牌匾的顿悟。数年来，他购买收藏数百件漆艺精品，更遍访全球漆艺名家探讨漆艺之创新与发展。2016年，由他创办的沈绍安漆艺馆在西湖畔正式开馆并免费对外开放。这是福建省唯一一座以漆艺老字号命名的艺术馆，同时还配备了沈绍安漆艺研究院。2020年，沈绍安漆艺馆迁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朱紫坊芙蓉园，并改名为沈绍安漆艺博物馆。芙蓉园是清末福州四大私家园林，自南宋始，先后有14位杰出的文人官员和将领居住于此。沈绍安家族200多年来对传统漆艺的缀补与铺衍将在这座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古典园林中继续被品鉴与切磋。

透过芙蓉园展厅古朴光亮的橱窗，200多件福州脱胎漆器藏品风华再现。睽违已久的器物让人目夺神移，朱与黑，方与圆，金漆与彩髹，千文万华，绮丽灿亮。这些端凝锦绣的器物承载的是对中国漆韵以及大匠奇工的敬畏与感动。



小口漆瓶

考辨福州方言之古汉语“化石”（六）

◇施文铃

古代农耕社会，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餐在辰时进食，谓之大食，亦称朝食。晚餐在申时进食，谓之小食，亦称夕食。一天第一餐称谓大食，最后一餐称谓小食，并无中食，说明古人中午没有饭食。见《孟子·滕文公上》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言圣贤者与平民一样耕种获得食物，每天早晚吃两餐。闽人亦不例外，今之一日三餐源起什么时期呢？辨析福州话作息饮食俚语或许能找到答案。

早餐，老福州人曰饔【曾遮切2·读若姐】，见《汉语大字典》饔，早餐。古汉字“饔”字，在先秦时期就已创造，现代汉语已经不用了，福州方言一直沿用至今。

吃早饭，福州话曰喫(吃)饔，里人早餐多见吃稀饭，稀的稀饭谓之“𩚑(饭)糜【蒙归切5·读若梅】”。见《释名》糜，煮米使糜烂也。稠的稀饭曰𩚑粥，米汤曰𩚑【莺山切2】，亦称𩚑粥𩚑。古早喫饔比较简单，主食稀饭，常见配菜(下饭菜)：虾米、肉绒(松)、橄榄咸、大头菜、菜蒲仔(腌萝卜)、菜头柿(块状腌萝卜)等。旧时生活困难者，时有豉油(筷子沾酱油)配饭。随着社会发展，百姓物质生活提高，早餐食物逐渐多样化，常见品种有：扁肉(馄饨)、拌面、𩚑(锅)边沄【莺春切5·读若文】、馍馍(馒头)、豆浆、虾酥、碗糕、𩚑饼、胰炸粿等等。胰【莺伊切5·读若姨】，见《汉语大字典》注解：“胰，猪的两个肾脏之间

的脂肪。”又见《广韵》胰，豕息肉也。胰油，即猪花油。宋代已有胰炸粿，其词字在福州方言中相传至今，而普通话谓之油条。在老一辈人眼里，饭食吃一顿糕粿饼之类的食物，等价于几斤大米，太不划算。老话谓之“挨盘卖算买饼当顿”，注：挨，指会、能。卖(借音字)，指不。顿，《增韵》次也(饭食一次称一顿)。疏：挨盘，指货物盘来倒去(买卖)。卖算，指不精于计算利益。言买卖过程，善于倒腾货物，不精计算净利。买饼当饭食，吃糕饼花的钱远比自家煮稀饭贵的多，以糕饼当饭食是巨不划算的。寓意：做事不善于实质精算。

里人惯于勤俭持家，推崇以俭养德理念，省吃俭用蔚然成风。从福州民间歌谣《蜀头虾米咬式嘴》略见一斑。

妹啊妹，做依媳妇着消配，蜀(一)头虾米咬式嘴，佬官带家当爸孀，姆婢恰好像姐妹。

妹啊妹，做依佬妈听夫嘴，伊伯伊叔是长辈，



饔字源由小篆→楷体演变过程



虾米

亲戚大细着看重，做代(事)掇勳犯依嘴。

注：妹，旧时对闺女的昵称。依【日双切5·读若脓】，《六书故》注解：吴人谓人曰依，即人声之转。媳，见《字汇》俗谓子妇曰媳。妇，见《尔雅·释亲》曰：子之妻谓妇。着，《汉语大字典》能够；应该。表示客观上或情理上的需要。涪【时山切2·读若伞】，《说文解字》少减也。配，指下饭的菜。嘴，《汉语大字典》口；话语。嫫【日街切2·读若礼】，见《博雅》注解：“母也。楚人呼母曰嫫。”又见《说文解字》注解：“齐人谓母曰嫫”（吴越语遗存）。佻【求山切4·读若英】，《汉语大字典》聚合。掇【莺宾切1·读若英】，《方言》不用。勳【柳双切1】，《方言》不要。

疏：福州方言称谓子之妻曰媳妇，这词语与北方方言词义有别。古人，妇称呼夫曰官人，见《汉语大字典》注解：“官，古代妻妾对丈夫的称呼。”人老曰佬【柳包切7·读若漏】，会意。夫之父称谓佬官。又，旧时男女不平等，亦体现在族人间称呼，妇低夫一辈分，与子女同辈。故，夫之父称谓公公，呼“伊爷”，同儿女称谓“爷爷”一样。见《尔雅·释亲》注解：“妇称夫之父曰舅。又，妇谓舅曰公。”古代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内务“一把手”称谓带家，普通话谓之婆婆，见《左传·昭二十五年》云：“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注，夫治外，妇治内，各治其物。”带家治内，职责类似清朝兵船之管带，既管又带，“带家”不仅要管教媳妇儿孙，管理一家子财物，

处理亲戚人情世事等，带好媳妇，对后辈要“传帮带”。姆婶，普通话称谓妯娌，见宋代吕祖谦《紫薇杂记》云：“今俗兄妇呼弟妻为姆婶，弟妻呼兄嫂为姆姆。”旧时，内人称谓佬妈【蒙嘉切2读若马】，类同普通话称谓老婆。古人忌讳夸耀妻子的姿色，对外往往丑化内人，言家有丑妻且是老妇，谓之佬妈。俚语曰：佬妈阮第一，扒舢【柳春切5·读若轮】船阮第二。疏：古人常因妻有姿色招惹祸害（林冲），世人忌夸妻姿色，老婆总是别人的漂亮。而午日节乡间赛龙舟，是彰显家族人丁之健壮体魄有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团结奋力争第一。大细：指族亲的长辈和晚辈。犯依嘴：言行冒犯他人，与人争执吵嘴。这是一首传统家训民谣，女儿出阁时，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做人的道理。

释义：闺女出嫁时的情景，母亲叮咛女儿的话：“闺女啊闺女，你嫁夫家，做媳妇生活要节俭，吃饭要少吃配菜，一头小虾米不能一口吞，应要匀做配两口饭。要把公婆当作亲爹娘孝顺，妯娌相处不可闹矛盾，就像亲姐妹一样和好。闺女啊闺女，你已嫁人了，出嫁从夫，夫唱妇随，做贤内助。要尊重伯伯和叔子等长辈，今后凡是亲戚都要以礼相待，不可怠慢，邻里要友善和睦，做事不可与人吵嘴。”这样场合母亲常是喜极而哭，后来就演变成哭嫁民歌。

晚餐，老福州人曰飧【蒙山切5读若盲】，见《汉语大字典》飧，晚饭。先秦时期已有表达夕食的“飧”字，在福州方言一直沿用至今。

福州人吃晚饭曰喫飧，旧时晚餐通常吃𩚑粥，时有吃糯𩚑（干饭），糯【气优切3】，《广韵》干饭。土灶烧柴火爨【非伊切4】𩚑，煮出来就是“糯



飧字源由小篆→楷体演变过程



炊甌舛

舛”，今用电饭锅煮干饭异曲同工。若是就餐人数多，一锅煨不了那么多干饭，通常做“炊甌舛”，甌【时装切5】，《说文解字》甌也。又见《方言》甌，自关而东谓之甌。用杉木做的圆筒蒸笼，俗称舛甌，蒸出来的米饭浓溢杉木清香，好好吃。

里人曰：三菜式汤糍舛再汝磨。注：磨【日装切1】，借音，指往里捶。疏：里人吃干饭，有喝汤的习惯。再汝磨，指让你尽力吃。旧例，请人帮工要办膳食招待，通常三菜式汤，干饭放开肚子吃，喻随你吃个够。旧时，乡村民间组织壮丁安保自卫队，常在晚上习武，夜宵通常煮稀粥，谓之“喂粥”。言人“喂喂喂粥其（有吃夜粥的）”，注：喂【莺姑切7】，《字彙补》有也。喻有功夫。

直至宋元时期，底层民众每天还是吃两餐，见宋朝诗人高公泗诗云：“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暇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当时一般人家吃不起三餐，还是维持一日两餐过日子。明朝南方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早起晚睡，增加劳动时间创造物质财富，百姓生活得以改善。常常是“睏半喂起三更”（睡半夜起三更），注：睏【气装切3·读若抗】，《方言》睡也。喂【蒙山切5】，《玉篇》夜也。言劳作到半夜，三更又要起床干活。俚语曰：起三早彻（能抵）蜀工，言早起三天增加劳动的时间，累加起来能抵上一个工日。古代通常在辰时吃早餐，然后下地干活，到申时吃晚餐，一天

劳作三个时辰。若是每天提早一个时辰起床，那就是在卯时，这样一天能够多出一个时辰劳动时间，早起三天就多三个时辰，相当于多了一个工日。但是，每天劳动时间增加了，早饭到晚饭间隔四个时辰，这么长时间体力劳动，体能难以维持，中间须有加餐点心补充能量，就有了吃点心，后来由于中午吃点心，演变成吃午餐的习惯。古汉字原本就没有造表达午餐的汉字，闽人则用“喂响”一词，表达在中午进餐，会意。从里人老话中印证福州方言“喂”字的用法，喂【低包切3】，见《汉语大字典》注解：“正午；半天时间。”又见《篇海》喂，午也。俚语有：中【低装切1】喂（中午）、破中日喂（正午；当午）、上喂（上午）、下喂（下午）、日头喂（中午时分）、煮喂（煮午饭）、喂喂（吃午饭）、歇喂（午休）、过喂（过午）、睏喂（午睡）、餐喂（晚饭；午饭，泛指饭食）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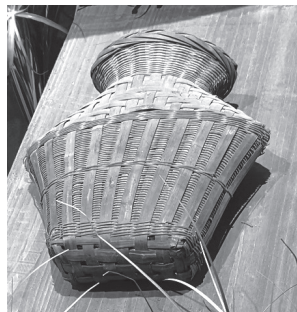
明清以来，南方经济发展比较快，百姓一日三餐基本普及，而从事手工艺、工匠等体力劳动者，为维持体力餐间加吃点心。里人谓之“三喂（吃）式点心”，疏：三喂，指一日三餐。言平日三餐间还吃两点心，喻一日多餐养身体。

福州方言带有“喂”字俚语例句：

1. 喂餐喂喂，注：喂【蒙高切5·读若毛】，《方言》无；没有。疏：“餐喂”泛指饭食，言忙碌顾不上吃饭。

2. 喂喂迟，餐还在（午餐虽迟，晚餐少不了）。注：喂【蒙坊切2】，《集韵》心不在焉，忘情貌。疏：吃午饭虽迟，晚饭不会排挤掉，照吃。寓意：该有的少不了。

3. 七十喂留喂，六十喂留餐。疏：传统礼节，有客自远方来，好酒好菜款待之，通常晚饭后，天



簞



踏侔

已不早留客过夜，挽留住几天。旧时人的寿命短，五十岁谓之上寿，进入老人行列，七十古来稀，算是长寿者。常言道：耄耋老人，今日在！明日在？言年岁已高的老人，出门走亲访友，自是谨慎为善，七十岁串门做客，自不可留下吃午饭，六十岁不宜吃晚饭和留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4.煮响依客够，鑊呢加蜀碗水。注：够，《汉语大字典》谓手等达到，触及；表示达到某种程度。疏：旧时交通不便，通常上午出门走亲访友，下午赶回家。适逢煮午饭时来客，要留客吃午饭，只好往鑊（锅）里加一碗水冲稀饭粥。寓意：稀释应酬。类似俚语：请客甯（不）差蜀双箸，言酒宴不在乎多请一人或意外多来一个客人，酒桌上再加一双筷子而已。寓意：多一个无妨。

5.猫吮飧，犬吮响。疏：老鼠为四害之一，养猫捕鼠除害。家猫不可喂夕食，饿猫夜间才会去寻食。养家犬为着夜间守门户，白天没任务没必要喂食，因此，家犬喂夜食看家门。

旧时候，体力劳动做的狠，吃的伙食差，里人谓之：“馐做吮喫”（有做没吃）。注：做，指劳动；忙碌。喫，指饮食；伙食。疏：一年到头辛苦劳动，收入微薄依然衣食不济，平日吃不上荤菜。民间童谣《涓涓配咬伢仔》，以写实手法，描写“馐做吮喫”劳动场景。

踏水侔，侔池仔。

水侔厝，搨鱼仔。

踢跳跳，园籐仔。

洗澈澈，排鑊仔。

煎酥酥，躲盘仔。

涓涓配，咬伢仔。

那大配，骂晏仔。

晏仔，晏仔只大配，

蜀头做蜀喙。

注疏：侔【出遮切1·读若差】，绕轴转，指水侔转动抽水。水侔，人力抽水农具，类似抽水机。仔【求厅切2】，《汉语大字典》小孩子。引申指细、小。厝【低嘉切1】，《玉篇》干也。搨【日枝切8】，《汉语大字典》捕捉。园【气装切3·读若困】，《方言》隐藏。籐【柳钗切2】，《威林八

音》盛鱼竹器。澈【他嘉切4】，《汉语大字典》水澄清。鑊，铁锅。涓【时山切2·读若伞】，《说文解字》少减也。配，指吃饭配菜。伢【柳登切4】，《说文解字》数之余也。伢仔，指一点点。大配，指吃饭时多吃配菜。晏【莺山切4·读若暗】，《汉语大字典》晚；迟。晏仔，指长不大的孩子，不懂世故。喙【出归切3·读若翠】，同嘴。

旧时，踏侔抽河水灌溉水田，水侔两头水位落差越大，踏侔越重。通常两个人或四个人一起踏侔。老话说：“做田毛踏侔，故闲做老爹（官爷）”，说明踏侔很辛苦。那时候没有抽水机，侔池只能用人力踏侔抽水。歌谣侔池仔，描述池塘抽干水抓鱼的劳动过程，小池塘侔厝（抽干）只捕到小小鱼，抓到的小鱼蹦蹦跳跳，若放到桶里，又怕鱼跳出桶逃走。放入■仔，鱼■口有鳃盖，鱼放进去不能出。洗澈澈提回家，小鱼怎么煮呢？只好搁在小鑊煎。鱼太小只好煎到酥脆，煎酥酥鱼骨头都能吃，盛小盘配饭。父母根本就舍不得吃，嘱咐孩子要涓涓配，吃一口饭咬一点点。孩子偏不听话，父母越是要求涓配，他越大配，被责骂晏仔，孩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吃一头。

歌谣古语古字飘逸浓郁的虾油味，具有很强的场景画面感。浮现眼前劳动过程的场景，从抽水开始的侔池、搨鱼、洗鱼、煎鱼。虽是鱼仔（小鱼），侔池过程是很辛苦的，费老劲捕获鱼仔，但是，来之不易。享用劳动成果，吃鱼过程。在物质匮乏年代，鱼仔也挺稀罕难得，大人“馐做吮喫”，孩子只能“涓涓配咬伢仔”。

新时代，普通大众解脱几千年来肩扛手拉的体力劳动，百姓丰衣足食过上小康生活，里人谓之“馐喫吮做”。疏：时常大鱼大肉享口福，饱食三餐不用干体力活，身体长赘肉，还得花钱去减肥。旧时“馐做吮喫”，众生相是面黄肌瘦，所以羡慕胖子，大腹便便者谓之“福相”。当今“馐喫吮做”，身体尽长肥膘，胖墩谓之“破相”。古今之“命相”乾坤倒翻，福满人间。

注：【】内福州方言八音注音，读若某，某为直读音

闽台城隍信仰的变迁及其现代转型思考

◇杨济亮

城隍，起源于古代的“水庸”祭祀，属于先秦时天子八祭之一，城为城郭，隍为护城壕，后逐渐演化为中国城池的保护神。根据正史记载，祭祀城隍最迟在南朝齐梁之际（公元6世纪）已出现。关于城隍神守护城池的记载，最早见于《北齐书·慕容俨传》，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军事坞堡庄多垒镇寨。天保六年（555），慕容俨被南朝梁军包围于郢城时，梁军以水草荻洪和铁链断绝郢城水路供应，“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慕容俨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飏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乃解除郢城之困”。如今，在福建不少旧时军镇卫所地依然有城隍庙宇香火留传下来，如福清海口镇东卫城隍庙在卫治东偏，马尾闽安镇城隍庙在凤髻山顶，连江定海城隍庙在城隍山巅，万安千户所城隍庙在所治之后，梅花千户所城隍庙在所治之旁，晋江福全所城隍庙等。

唐代，郡县开始祭祀城隍，多是作为祈晴求雨的对象。五代，城隍已十分普遍受到统治者的封赠，被视为城市保护神。宋代之后，城隍的职能扩大为主管一城的降雨抗旱、放晴防涝、生儿育女、发财致富、剪除元凶、护国安邦之事，甚至执掌阴间亡魂。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上都建城隍庙，元代开始有了“都城隍”的名号，城隍成为国家守护之神。宋元乃至明清，城隍形象人

格化倾向愈发明显。明洪武二年，太祖朱元璋把城隍祭祀列入国家祭典，并对城隍按王、公、侯、伯四级封爵，下令各级行政单位建立城隍庙，城隍信仰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朱元璋想利用城隍来威慑百官，教化百姓，规定百官上任首先要去敬谒城隍爷，对神明起誓而后视篆。如果地方有事，地方官要向城隍祷告，以求庇护。城隍与阳世的知府、知县，幽明并举，共同负责地方安宁。明初，朱元璋对大学士宋濂说，“朕立城隍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天下不敢妄为”，其政治出发点在于使“神人合德”“佑国庇民”，即通过神明威严来要求地方官遵守儒家政治道德，这当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已。由于普遍低薪，所以，明朝多数官员往往并不惧神威，相反是鱼肉百姓，不断捞取民脂民膏。

同时，城隍信仰无形中形成一种道德规范网，对信众心理形成巨大的威慑力。城隍的形象使人敬畏，城隍庙中的对联、匾牌都是劝人为善、莫做坏事的海人警世之作，而神像的高大凶恶、昏暗的寺庙环境、栩栩如生的壁画场面都让人心生畏惧，从而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威慑，无形中与封建统治者的皇权一起教化世人，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以神权统治的一面。

相对于统治者的政治考量，民间更希望城隍“治理阴间，统领百鬼”，不要出来作祟、危害百姓。因此，每逢城隍诞，则要举行“迎城隍”赛神

活动。随着人员的往来和城乡经济的交融，城隍信仰也由城市扩展到广大乡村，包括户所城和镇堡等地，不再局限于县邑。

冶山都城隍庙是晋太康三年福州太守严高迁城时所建，主祀汉御史大夫周苛，是全国第二早的城隍庙宇，距今已有1700多年了。梁克家的《三山志》中这样记载：“城隍庙，府治之东，古有之。晋太康迁城，即建今所。绍兴二十七年，沈待制调增创厅宇，寻置兴福庵其东。淳熙五年，前作更衣亭、肃仪亭。今十二邑皆旧附县治置。”仅晚于迄今发现文字记载最早的东吴赤乌二年（239）的芜湖城隍神祠，但福州城隍庙是最早的州郡城隍庙，“省垣坛庙，此为最早”。宋元祐戊辰，长乐人林通作本县《图经》，内《县东北城隍庙》曰：“庙之神，西汉御史大夫周苛也。守荥阳，为项羽所烹。高祖休兵，思苛忠烈，乃令天下州县附城而立之庙，以时祀之。”后来，“有功烈于民，能御大灾、捍大患者，歿则祀之”，如忠惠之蔡襄、勇武之汤和、义烈之卢琬等功臣名



城隍庙官地碑

宦均在陪祀之列。明洪武二年，福州冶山城隍庙为“监察司民威灵公”。在清雍正年间，该庙获得“都城隍”赐封，确立了在福建城隍信仰中的最高地位。

城隍信仰与民俗文化

明代官方版的城隍科仪主要是上官仪、祭祀山川城隍礼、祭厉礼三种。官方还在地方志书中不断地通过包含城隍信仰在内的神教书写宣扬符合王朝统治秩序需求的道德教化，官员也会时不时参与向城隍祈雨活动。而百姓希求城隍爷执法公正、救民水火，消灭业障、安抚游魂、体察阴阳，奉天乞雨，因此就会向城隍爷敬献祭品，演戏酬神，还衍生出一整套科仪和斋醮等神俗。冶山福州都城隍是农历四月初六神诞，五月十二诸城隍聚会，从九月二十六日坐堂，设祭演剧，十月初一出游城内，从公馆出发游南台，最后回到庙里。城隍神出游，俨然大官气派：前有马牌击鼓，鸣锣开道，后有“肃静”“回避”开路牌紧跟，随后是手捧香炉、身佩香袋的香客队伍；香客之后是端坐在八抬大轿中的城隍神，轿前有执香童子、鬼判之类；最后是仪仗队伍和乐队。而永泰县长庆莲峰村城隍庙神诞是从每年农历五月初四开始，第二天“端午节”神庙暂停活动；五月初六是“交天”日，请出城隍大驾，初七初八夜，由擢魁境保安堂、福寿堂等八个香会参加查街；五月初九神诞活动达到高潮，是夜在庙内演戏；五月十一日是“寿诞”正日，设宴祝寿，踩街活动等。泉州地区的祭城隍则成为中元节民俗活动之一。台湾南部城隍诞在五月十三日，最神奇的是新竹城隍爷尽然有三个神诞日。在移民台阳的过程中，有大量不幸遇风海难的，民间认为那些游魂有赖城隍爷引路归乡。对于因械斗、民变、天灾或孤身渡海沉溺死于非命的孤魂厉鬼，也被后人移植入城隍信仰之中。

城隍信仰带动城市庙会经济

清代，福州城隍神信仰最为鼎盛，整座冶山几乎全被城隍庙及其相关庙宇所覆盖。因此，当



台南城隍庙

时人们又将冶山称为“城隍山”。旧时，福州城隍神从九月二十六日坐堂，设祭演剧，十月初一出游城内。城隍神的祭典与庙会结合，娱神娱人的同时也促进了商贸活动，城隍庙成为民俗活动和商业中心。庙会期间，远近商贩云集，摊贩林立。城隍庙会上除了祭拜神灵的香烛纸钱外，还出售各乡土特产品，这些货物，价廉实惠，符合百姓的消费水平。由于城隍庙地处市中心，人气旺盛，故许多原本赶庙会的“行商”，逐渐“沉积”了下来，成为“坐商”，开店铺做生意，渐成商业街区。明代，福州以城隍命名的街坊“城隍坊在依仁坊、直街之北城隍庙巷口”，清代以后“庙之南为城隍街……左一径称城隍崎”。而庙前的城隍街，至今仍在，故名犹存。当地老人说，至20世纪80年代旧城改造之前，城隍街两旁依然商店密集，生意红火。

明清时期，城市的发展与商贸的繁荣，使得福州城隍庙与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关联也体现在一些习俗中，城隍庙不单在经营成功的商人捐助下得以修建，城隍庙也成为一些经营不善的商家年关避难躲债的场所。福州旧俗，每逢年关，一些慈善家就出面捐钱，邀请闽剧班社分别到城内城隍庙、南台尚书庙通宵达旦地演戏，让城内的欠债商户，分别到城隍庙、尚书庙去看戏躲债。可见明清时期福州商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与城隍神信仰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

城隍信仰折射官民之间对公正的博弈

唐代时，城隍神神格由城池的自然神转变

为人格神，由地方守护神开始入主冥界，具有阴间审判的功能，城隍信仰系统与祭厉信仰系统合流。此后，由于明代政府对于神道设教的强烈企图，与清代因袭明代的相关城隍信仰之规定，不仅促使城隍神成为阴间司法神的重要基础，也再次强调城隍神对于阴间事务的主管权。城隍神的职能多重、角色的扩充，横跨阴阳两界，更显其角色地位的重要程度。因此，城隍爷其角色具有功能性的存在，城隍掌阴间司法、判阳间善恶的形象，足具公正司法的象征。古人期望，对于罪恶的追究，可以不受时空的约束；而正义的执行者，则可以超越人间法官血肉之躯的局限。在中国传统社会，正义诉诸理性，也植根于人们的感情；正义有赖于法官的贤明，甚至于神灵的报应；只有在城隍神的法庭上才可能实现远比国法所能企及的更大的正义，就是使一个人对其生前死后一切行为负责的因果报应的正义；源源不断的报应故事使神迹和神明建立起了因果联系。历史上，地方官员审判案件时，遇到被告坚决不交待实情时，照例是押到城隍面前立誓，以神明的威严作为治服的手段。地方官吏觉得难以决断的案件，也常常夜宿城隍庙，以求城隍托梦指点。信徒们有时因争讼纠纷也往往相约到城隍庙宰鸡头，“发重誓以释争端”。这在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可以看到。海外华侨甚至将神判法仪式移植到新移民地区，比如我们在荷印吧城公堂文书档案中就可以看到华人移民曾经竭力保持自身的中华特色的法律文化传统。可以说，城隍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公正”的神话表达，官民都曾参与其中。

城隍信仰反映民族融合建置沿革的历史记忆

平和县九峰乡都城隍庙的城隍爷，当地百姓说是唐代诗人王维，实则为王守仁。说明赣闽粤交界地包括畲民在内的新民，不以镇压他们的王守仁为仇，反而尊之敬之，衷心感激王守仁的宽大和教化、引导，这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认同了与汉族融合同化的事实。类似的情形在更早的闽

东也存在。古田县城隍庙所祀奉的是唐开元年间第一个“编户立县”的土官刘疆，史书对刘疆的记载笔墨不多，其“生卒年无考，系古田建县肇基者。唐开元前，古田尚未设县，时有土民千余户依附刘疆。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刘疆与林溢、林浹等率众献地于唐，愿编为县。翌年四月二日获准置县。唐玄宗嘉其忠顺，令其掌管县事，赐名疆。不久，刘疆请求另委主而携其子弟、族人隐退。”刘疆因建县有功被封为古田城隍，他的部下林溢、林浹在明代也被敕封为屏南城隍。

在福州市鼓楼区屏山东麓，有一座明崇祯三年（1630）始建龙峰境泰山庙有两幅清代保存下来的城隍壁画，其中左边的一幅即绘有台湾府城隍的形象，与其他内地府州城隍一起共有十府二州城隍，左边是兴化府、泉州府、建宁府、汀州府、永春州；右边是福州府、漳州府、延平府、邵武府、福宁府、龙岩州共同向端坐在大殿里的东岳帝君敬谒。这些城隍群像虽然不是出现在“福建都城隍”庙里，但其中“台湾府”作为福建“十府”之一，特别引人注目，它见证了台湾在尚未建省之前曾隶属于福建管辖两百多年之久的历史。

城隍信仰的入台及其现代转型

由于城隍具有巩固和强调政权正统性的功能，统治阶层为了能让治权下至乡里，所以对城



刘公纪念祠



台湾金门城隍庙

隍神的神格控制并不严格，一个县级的城隍庙也可能自称“都城隍庙”来自我夸耀，可见民间信仰的随意性。平潭五福庙又名威灵公庙，原称驻镇都城隍庙，始建于明代。据载，清康熙十七年（1678），海坛设总镇，庙从镇东卫移建现址。因庙处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福兴境，加上建造者叫陈福，故取名五福庙，寓意祈求五福。殿内供奉有福建都城隍和台湾府城隍，后者是平潭赴台班兵从台湾移来的，相传是1895年割台内渡的平潭籍官兵带回的。反映了他们“土地虽然被迫割让了，但守境之神仍要守护好”的情感意味，体现了他们对曾经戍守的台湾领土的眷恋。五福庙是一座“一庙两城隍”的城隍庙，这一独特状况较为罕见。

台湾府城隍移奉平潭后不久，由福建赴台的官吏、将士、商人、船员均到此叩拜，祈求庇佑。此外，台湾商船来岚经商贸时，也要到五福庙烧香祈福。两岸民众对其顶礼膜拜，共同将之奉为“除暴安良、护国安邦”的保护神。

平潭请来了台湾城隍，无独有偶，澎湖马公岛上的“海山馆”也出现了海山城隍，这是由平潭籍士兵换防到澎湖时，由家乡移奉过去的。为了解决换班、退役的戍兵以及等待船舶返回平潭同乡们的食宿问题而建起了海山馆，庙中祭祀海神妈祖和海山城隍。后来，澎湖海山馆成为了在澎湖的平潭人聚会、住宿、祭祀等的主要场所。另外，在台南安平街也有一座祭祀五福爷的“海山馆”。五福庙与海山馆见证了海坛镇水师与台



台湾新竹城隍庙

湾、澎湖戍兵换防守土的那段历史，证明了闽台两地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

当然，城隍信仰入岛不只有一条线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是明郑时期，由郑成功兵士从福建移植过去的在台南所建的台湾府城隍庙。后来，一些大陆移民也陆续带了原乡的城隍神像来台，兴庙供奉。如永宁城隍、安溪城隍、惠安城隍、同安城隍、海澄城隍等。由于泉州移民曾占鹿港人口总数的八成以上，鹿港城隍庙与永宁（石狮）城隍庙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各地主祀、附祀晋江永宁城隍的庙宇有100多座，其中从安溪城隍分灵到台湾各地的“清溪城隍”庙宇竟多达221座。

此外，台湾诸罗、凤山、淡水、安平、彰化都陆续建起了城隍庙。至1918年，全台共有29座城隍庙，数量在全台各种神明庙宇中排名第20位。绝大多数的台湾宫庙与福建宫庙十分相似，有些宫庙以聘请到闽籍师傅主持为荣。

台湾城隍信仰在清朝统治时期基本上是被政权提倡的，进入日治时期后，王朝政权支援的优势没有了，城隍信仰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但仍拥有坚强的民间势力支持，因此并未随之消失。不过，留下来的并不是前清时期的祀典礼仪，而是民间发展出来的祭祀活动和信仰模式。城隍庙会活动一直到皇民化运动之前都是相当活跃的，虽然日治政权并不积极利用城隍信仰的神道设教功能，但却依赖城隍庙会活动带来的商业利益，这些经济功能有助于活络地方商

贸，而总督府的财政收入自然也增加不少，因此在皇民化运动之前，官方不但没有禁止，甚至大力鼓吹。

日治时期是台湾社会加速进入近代化的时期，受到内地化和近代化的影响，城隍信仰的内涵也有所转变，其转变在皇民化之前大都是渐进的自发的。但自社会教化运动展开后，受时势所迫，城隍信仰逐渐朝着日本化的方向被改造。信仰内涵的转变包括了城隍神形象和城隍庙会活动内容。基本上，城隍是属于台湾人的信仰，也由于台湾人对其坚强的信仰，使之仍能够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寺庙整理运动期间）存续下来。大多数具有殖民者身份或统治阶级的日本人，并不认为城隍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信仰，他们之所以介入城隍信仰领域，主要出于经济上或政治上的目的，只是视其为一种手段而已。

目前，全台城隍庙约有四、五十座，新竹城隍庙是最大的一座了，据传，其为当年施琅复台后按照闽安城隍庙图纸仿造的，但也有说是建于乾隆年间。日据时期，鹿港城隍庙信众冒着风险，组团到石狮城隍庙进香谒祖。鹿港城隍庙在1956年就捐田资助文教，改革开放后也多次捐资石狮市文教事业。台北霞海城隍庙分香自同安后溪霞城隍庙，每年两庙都同日绕境巡安，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1989年3月，台中市灵兴宫组团到永宁城隍庙谒祖。1990年9月以来，台南县六甲乡保安宫、南投县竹山镇灵德庙先后4次组团到福州拜谒城隍祖庙，并捐资修建祖庙。1991年5月，台中市灵兴宫再次组团到永宁城隍庙谒祖。1994年，石狮市也组织道教代表团到台湾回访。1997年3月，泉州市道教代表团也应邀到台湾访问，受到台湾道教界热情的接待。据《福州市宗教志》载，台湾各地现有的大小49座城隍庙，均奉福州冶山都城隍庙为祖庙。20世纪80年代后，台南、鹿港、南投、新竹等地台胞组织进香团，专程来福州寻根认祖、晋谒祖神和分灵节仪式。两岸城隍信仰交流活动进一步扩大，福州都城隍祖庙成为连接台湾信众乡情神缘的重要纽带。

百年风雨五里亭

◇ 缪淑秀

五里亭，始建于明代，因位于水部门外驿道五里处而得名，是榕城儿女向海而生的历史见证。

明洪武年间，驸马都尉王恭主政福州，修建府城，设置东、西、南、北、水部、井楼、汤门等7个城门。出西、北城门即福延古道和福温古道，出南门往今上下杭方向。水部门位于东南方向，出城门为福马古驿道，沿鼓山南麓到下院转经魁岐至马尾港。府城外此四个方向三五里处各设置一亭子，分别为梅亭、思儿亭、茶亭和五里亭。

今五里亭坐落于晋安区鼓山镇后浦村，是福州主城区现存唯一一座古代送别长亭。

风起云涌，开辟海丝之路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派江吻海，是个一城秀水半城山的滨海城市。《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

早在先秦时期，福州先民们便开始从事海上生产生活，海上贸易在汉代萌芽。从三国时期吴国“置典船都尉，领谪徒造船于此”起，福州一直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造船基地。盛唐以后，海上贸易勃兴，福州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五代时期，王审知及其家族主闽，开辟甘棠港，招徕“蛮夷商贾”，发展对外贸易，奠定了福州港居于南北海运枢纽的贸易格局。宋元时期，

福州继续保持着与日本、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

至明代初期，我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等手工业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当时，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资也有较大的需求。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担任使团正使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走访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东非、红海。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船员最多、历时最久的海上航线。期间，郑和在长乐、马尾等水域开辟港口，以便驻泊候风、扬帆出海。至此，福州的海上贸易达到了鼎盛期，境内有了太平港、河口港、马尾港等20多个港口，经由福州港，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越洋过海，远销异域。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福州也由此形成了融合闽越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为一体的闽都文化，而开放包容的闽都文化孕育了一代代敢闯善谋的榕城儿女。

马尾港位于福州东南闽江分流台江、乌龙江汇合处，是个淡水良港，也是福州的门户港。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马尾港的作用日渐突显，往返城区与马尾间的福马古驿道的行人逐渐增多，五里亭也随之而建。

血雨腥风，守护美好家园

海上交通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也带来外敌的侵扰。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猖狂袭扰我国东南沿海，见证海上商贸繁荣的五里亭也经历了抗倭斗争的血雨腥风。

明万历和清乾隆《福州府志》记载：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八月，“倭数千人由海入寇，至福宁，转掠而南，遂逼省会。四郊被焚，火照城中，死者枕籍，南台、洪塘民居悉为灰烬”；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倭蹂连江，逾北岭，复逼会城，转攻福清县，陷之”；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复由福宁度古岭，劫福州。城门昼闭，掠近郊”；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倭大掠连江诸村，穷谷深山，无不焚毁屠戮，财物罄掠无遗，凡三阅月。时倭舟尚屯沿海，复掠省会诸村，城门昼闭弥月”。

连年的倭患侵扰，让东南沿海百姓民不聊生。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倭寇纠集万余人妄图攻占福州，其中一支近千人队伍占据了福州东郊五里亭，焚掠周围村庄，屠戮乡民，构筑营垒伺机进犯水部门。乡民们激起反抗，但由于缺乏正规训练和精良武器，终被击溃，伤亡惨重。之后，城内官兵开城出战，也未能突破倭寇防线。

此时，戚继光率领的精兵在闽东剿灭横屿、



戚继光

牛田、林墩的倭寇后，抵达福州南台，获悉五里亭倭情后，立即带领3000精兵从大坂北袭五里亭，以“鸳鸯阵”一举将近千名倭寇全部歼灭。一夜间，五里亭附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大获全胜的军民在五里亭高唱凯歌：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乡民们将牺牲的烈士遗体厚葬于东郊高山，把倭寇尸体埋于五里亭周围的泥沼地。

据当地居民回忆，以五里亭为中心，东郊西起紫阳、砌池、讲堂前诸村，东到秀坂、凤坂、后浦、连潘等地，以及南边的象园村，方圆数华里的郊野上曾有18座掩埋倭寇的土墩。到1958年，这些土墩才被平整湮灭，仅留下五里亭附近福慧寺内的“崇玄坛”倭墩。

风云变幻，寻求救国之路

此后三百年间，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远洋活动促进了地球上各大洲之间的沟通往来，东西方之间文化、贸易大量增长，伴随着的是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的涌现。欧洲殖民者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触角遍及世界各地，在“坚船利炮”的全球扩张下，亚洲、非洲、美洲等地纷纷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泰西诸邦均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炫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连失败，英法联军步步紧逼，“至杭属及宁、绍台、温滨海之区，海盗时有出没，水师直同虚设，舰炮全无。”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认为：“欲治海盗以固海防”，必须造炮船以资军用，防洋人入侵，尤“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

马尾附近群山拥抱，沿江而下，两岸峰峦夹峙，有闽安、管头、长门、五虎为锁钥，闽江口有琅岐、粗芦、川石等岛屿为屏障，地势险要，是兵家防守要地，且离福州城区只有20多公里。

清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选择在马尾创建了总理船政（之后更名为福建军政府船政局、福州船政局等），具备军舰制造、海军和工程技术



2006复建后的五里亭

教育、舰队编练管理等职能，任命侯官（今福州）人沈葆楨担任首任总理船政大臣，组织外国技术团队协助中方设厂、造船、兴办近代教育。此船政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近代舰船工业基地、近代海军教育基地、近代舰队编练基地，也是近代中国特设的第一个海防近代化事务机构，创造了诸多的历史第一，被誉为是近代海军的摇篮。

马尾船政所建造的舰船占当时国内舰船总量的70%，除了用于组建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福建海军，还为北洋、南洋两支水师配备了大量舰船。而船政学堂则为中国培养了严复、邓世昌、萨镇冰、詹天佑等629位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如今，作为福州四大城市雕像之一的严复雕像正矗立在马尾马江渡广场，遥望江海，守护着福州的东大门。

此时，福马古驿道的交通也达到鼎盛期，有多少仁人志士从这里出发，告别五里亭，奔向远方，为积贫积弱的民族寻找一条强国保种之路。

沐风栉雨，远走异国他乡

福建地处丘陵地带，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适宜耕作的土地面积极其狭小，随着中原人口大量南迁，人地矛盾急剧突显，再加上连年

的征战，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福建人开始漂洋过海，远走他乡。

“播种之后，听其自生，不事耕耘，而收获倍蓰”，仅一水之隔的台湾气候温润，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成为了榕城先民迁徙的首选。

早在先秦时期，闽越族已经陆续移居台湾，成为台湾岛的先民。福建汉民移居澎湖、台湾始于宋代，而首次移民高潮是明天启年间。以颜思齐、郑芝龙为首的海上武装占据台湾北港时，适逢福建沿海旱灾，三千贫民竞相赴台。崇祯元年（1628），福建饥荒，郑芝龙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再次招徕沿海灾区饥民数万人移民台湾垦植。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氏军队及眷属3万多人移居台湾。同时，大力招徕因清廷“迁界”而流离失所的大陆沿海民众，“不愿内徙者数十万人东渡，以实台地”。

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寇派兵侵占台湾南部琅嶠、牡丹等地。清廷委任沈葆楨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沈葆楨随即携船政学子跨海赴台，勘探台湾海防情形与风土人情，并着手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沈葆楨推动台湾与大陆自由通商、通航后，再次迎来福建人口入台高峰。

福州的先民们在五里亭告别亲友后，一路行至马尾港后漂洋过海。如今，五里亭一带的老人还依稀记得当年传唱的《五里亭送郎歌》：“送郎送到五里亭，杨柳依依是奴情。此去台湾千里路，马尾港外波不平……”

《后汉书》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险阻，沉溺相系。”东冶，即当时福州的称谓，可见先民们背井离乡的历史是声声泪字字血。

据统计，如今福州的海外华侨、华人同胞多达300余万人，分布在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祖籍福州的台湾同胞约80万人，有海水的地方几乎都有福州人的足迹。

风雨同舟，共享盛世繁华

600多年来，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五里亭

始终宛若一位处世不惊的老母亲，守候在儿女必经的路上，以她柔弱的身躯为他们遮风避雨，以她的刚毅与坚韧给予每一个从这里经过的人们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力量。

五里亭曾一次次被摧毁，又一次次得以重建。1998年，后浦村民在五里亭立交桥西南侧挖掘出土4根落款“宣统辛亥年季秋吉旦”的石柱。为保护古亭遗存，乡民们四处奔走筹资。2006年，在文物部门的指导下，一座明清风格的四角亭在后浦村后浦路62号落成。

后浦村原名藕浦。南朝之前，这一带还是一片荒芜，常有野兽出没。元嘉二年（425），阮弥之入闽为晋安郡太守，“教稼墙，兴学校”。从此，福州城东大片荒野开垦成了良田，还大面积种植了荷花，便有了“藕浦”村，后更名为厚浦、后浦。

重建后的五里亭为单檐歇山式亭盖，金色琉璃瓦，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柱子上依然清晰地



五里亭立交桥

刻着行、隶楹联两副：“宝剑烛天，龙降虎伏；福星当路，凤翥鸾翔。”“北极位尊，恩媿万家生佛；南闽地迥，灵钟五里长亭。”“北极位尊”为道教神仙中的玄帝，又称真武帝，楹联寓意为福佑旅人一路平安。

自汉唐以来，我国已有折柳赠别的习俗。唐刘禹锡《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清褚人获《坚瓠广集》卷四：“送行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为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

五里亭亦有“折柳赠别”之风，以祝福漂洋过海的亲友能如柳树般落地生根，所遇皆安。因此，重建五里亭时，为再现当年长亭送别的情景和后浦村的原生态风貌，后浦村民附建了一座“柳园”，精心营造了“灞桥惜别、葫池清赏、瓜井追思、桑溪流觞、碑前考古、柳下纳凉、草堂吟哦、榜书可仿、菜畦试栽、稻田观秧、古白舂米、石磨流浆”等柳园十二景。

作为福州东郊著名的古代地标建筑，2009年，五里亭被公布为晋安区文物保护单位。

在铭记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的方向。如今，“五里亭”已经成为一个区域名称融进闽都文脉里。

1992年，晋安区在连江路创建了以“五里亭”命名的茶叶市场，汇集了中小型茶叶商家600余家，成为展示全国茶类品种和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久之后，一个集茶叶产业链大数据中心、福州茶文化传播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研发中心等为一体的“世界茶港”将在这里诞生。

1993年，矗立在连江路、福马路口的“五里亭立交桥”建成通车，成为全省首座互通式蝶形立交桥；2002年，位于晋连路的“五里亭”社区成立；2019年，福州2号地铁开通时，在福马路上设置了“五里亭站”……

时光荏苒，岁月峥嵘，历经六百年的风雨，当年的东郊已是繁华的都市。伫立五里亭前，畅想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与榕城的日新月异，这应该是一代代前赴后继的先民们向往的愿景吧……

福清北区骑岭亭古驿道漫忆

◇陈金辉

古时福清北区交通闭塞，给人们出行带来诸多不便，北往长乐要经石湖岭古驿道，东到海口要攀爬骑岭亭古驿道。骑岭亭古驿道，位于福清北区岭兜亭山上，从融北公路眺望，古道犹如横亘在骑岭亭（也称岭兜亭）半山腰上的玉带足足有8公里，骑岭亭古驿道西坡路由半山腰旧路到山顶凹口处约6里路，倾斜度约30度。东坡路倾斜度约40度，由山顶凹口至岭兜，路程约为2里。山脚下是“骑岭下”自然村（现已更名为“玉岭”村），所以乡人便把建于村落顶上的山路称为“骑岭亭古驿道”。玉岭村有条陡峭的山路通往古道顶上最高的凹口。自凹口北行到山下这一段路为古驿道东侧路段。经北西亭村的上亭寮头、北亭、后坂等村落后可经石湖岭北上长乐县。凹口东下山为骑岭亭古驿道的东侧路段。下山后可直达岭兜里美、海口等地。三条路都在凹口处相汇聚，凹口扼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

骑岭亭古驿道修建于宋代，为石路，虽少了土路晴天扬尘和雨天泥泞的毛病，但也潜在坡陡石滑的隐患。我家住在骑岭亭古道不远处，我在童年就行走过骑岭亭古驿道，古道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小时喜欢到亲戚家作客，总想去见识外部的世界。我的大姐家住海口镇，到她家作客就必须翻山越岭，行走骑岭亭古驿道。家长总认为我

年幼不会爬山，但我不甘示弱，在我又哭又闹的力争下，我终于有了到大姐家作客的机会。在那次探亲队伍行进骑岭亭古驿道，我不但没拖大家后腿，反倒成了一名开路先锋，意气风发地领走在队伍最前头，把同行的哥们姐们甩在后头，沿着古道斜坡勇往直上。

行至山顶，见路边一面岩石上，留有一个一尺来长的凹形脚印，询问路人，方知仙人云游时路过古道，而今仙人飘渺离去，留下一只脚蹂躏岩面的左脚印。我想刨根究底，试图找到仙人的另一个右脚印而一时无从发现，只好作罢。心想神仙跨步高远，一步千里，另一个脚印不知踩在何处，不是一时能找到的。

继续沿古道下行数十步，见古道边有座庙宇，乡人称之为岭兜观音妈寺庙，庙宇已经倒塌，惟余残垣断壁。

我曾听老人讲述“岭兜观音妈裂面”的故事。说的是叶向高宰相的轿子正从骑岭古道东坡上行到半岭，突然阴风怒吼飞沙走石，叶相一行见路旁有一寺庙赶忙进寺庙避风。叶相进寺庙内所供的观音妈神祇乃自己游玩江西龙虎山时所见的狐仙，当时她修行期未满，却天天跪伏在仙君院里，要求仙君赦封委任职务，叶相给仙君进了一言“念其心诚，但封不妨”正是有了叶相一言九鼎之助，她才来到福清岭兜亭寺庙为王。叶相对着这位强势的神祇怒曰：“昔日若非老夫一言相助，

恐尔仍跪伏龙虎山院中耳。”听罢叶相此言，观音妈羞愧不已，如同被人撕破脸皮低头认错，请求恩人宽恕。古道上已是风和日丽，叶相起身上轿，安然通过骑岭亭古驿道。此后观音妈镇守一方不再希图买路费，只想确保旅人平安。平民百姓也很在意这位神祇的形象，央请能工巧匠修复观音妈裂面的形象，总是难以塑正端正的面容。

骑岭亭古驿道上还有一座贤兰寺遗址，据说当年寺内壁上镌凿一副对联，联曰：银在千里内，金在贤兰边。这副颇有诱惑力的招宝广告，引得人们争相在寺庙周边地带挖掘不已，但均一无所获，最终还是两位上京赶考的贫寒学子先后破译了“千里内”和“贤兰边”的密码而获得金银宝物。“千里内”即指“香炉内”，学子茅塞顿开，倒掉香灰抱走黑不溜秋的银质香炉。“贤兰边”的“边”与“鞭”谐音，即指贤兰佛祖手上所持的那条金鞭，取下那条金鞭即手到功成。贤兰寺寻宝故事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骑岭亭古驿道曾留下仙人的脚印和“观音妈裂面”“贤兰寺寻宝”的美丽传说。骑岭亭古驿道见证了达官贵人、凡夫俗子的悲喜人生。

骑岭亭古驿道是连接界内界外的必经通道。跋涉在古道上的“赶鲜人”把界外的鱼虾蛭蛤源源不断地贩卖到界内，换回界内稻米薯粉，他们是攀登古道不知疲倦的“挑夫”，为一家生计碌碌终生。由此观之，古道非官方专用之道，更维系着平民百姓的民生。历朝历代迎娶新娘的花轿往来于古道，促成了界外界内的民间姻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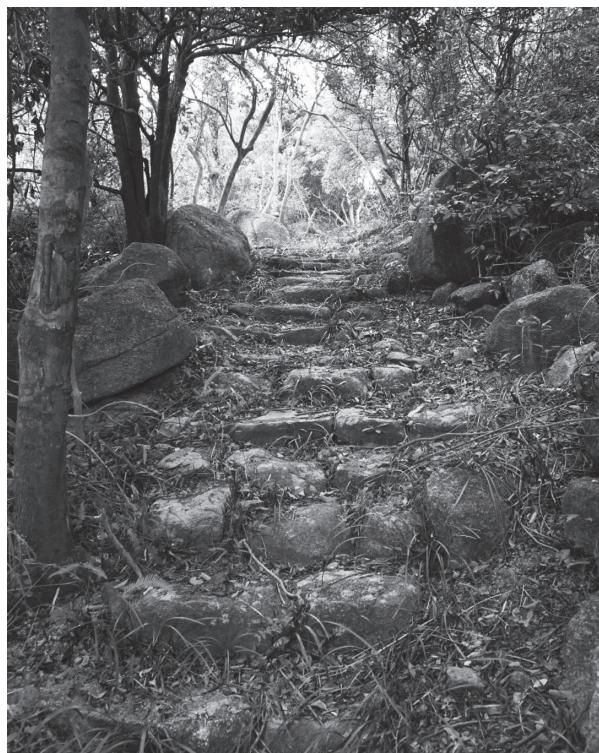
骑岭亭古驿道行经平洋地带，经过两处沟壑石桥——单块桥、双块桥。少年时，我曾在沟里捕鱼，我曾挑着柴担从容走过石板桥，负重行进在山岭古道上，将柴火卖到界外岭兜农场。

骑岭亭古驿道延伸到平洋路段，经过溧阳村油井田片，我而立之年曾躬耕陇亩于此。古道在长满山油茶树的“油井树弄”穿行而过，时至今日，弄道路石依然明晰可见，即便时光流转，今人还是亲切地称呼这段承载着悠久历史的道路为“官道”。

回首攀走骑岭亭古驿道，数十载时光流逝，

我从童年少年青年走到老年。有关骑岭亭古驿道的消息不断传来，先是闻说古道年久失修，荒芜到人们无法通行的地步，这让我大失所望，泯灭了重走骑岭亭古驿道的念头。近来又听说古道已经翻修，因这条步道曾是福清学子上京赶考、官员回乡省亲和商人往来贸易的主要交通步道，曾经这里也是明朝宰相叶向高上京回乡的必经之路，故又把这条古道称为“状元古道”，全称“阳下街道状元古驿道”。并在古道最高处立石勒字纪之。

如今在山脚下建起一条景观大道，与原山腰上的骑岭亭古驿道相衔接。我抑制不住再次亲眼目睹骑岭亭古驿道风采的渴望心情，在五月里的一天驱车回乡，前往古道路口亲近古道，伫立山下，深情遥看山峦起伏，古道逶迤。一阵沉思默想，仿佛叶相乘坐的轿子正缓缓行进在古道上，我平潭的舅舅和海口的大姐也在古道上步履匆匆赶路……再度定神凝望，不见古人仙人，惟余那条见证历史沧桑的古驿道上正游走着健身游玩的男女老少的身影。遥远的往事与眼前的幻觉实景交织发酵，让我品到千年古道留给后人绵绵不绝的沉香余韵……



鸦片战争时期闽籍诗人张际亮

◇邹自振

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已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而反映这一时期社会脉搏的诗歌也以新的面貌不断涌现。闽籍诗人张际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号松寥山人、华胥大夫，福建建宁北乡兰田人。他出身贫苦，母亲早逝，父经营木商，客死外地。赖伯兄资助，才得以入学，但几次考进士皆不中，一生都没有做官，过着羁旅浪游生活。从少年时代开始，张际亮就怀抱经国之志，锐意进取，但决不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终因得罪权贵，被视为“狂士”。

道光五年至八年（1825-1828），际亮大部分时间滞留北京。他默察京师官场恶习和社会积弊，谋求社会改革方案。他对当世之故，颇能言其利而救其弊，但无人荐举，失意之余，乃入歌场消愁，听伶人唱戏。他选取名演员数人，为之作传，以发其心中不平之气。书成，命名为《金台残泪记》。在书中，他提出“今天下之计，在用申（子）、韩（非）之法，核名实，严刑赏；用管（仲）、商（鞅）之法，理财用，强军备；若家习节俭，人怀教富，则本振而末无不举，源登而流无不清，蠹政皆将自革”。他不特主张用法家的方法来改革蠹政，还大胆揭发当时文坛颇为普遍的现象：“今世之治考据者皆以宗师、大儒自命，一

出为仕宦，类多名贪残墨黥，贻害国家，其次章者皆以才人、名士自喜，然类纵奢侈淫佚，以弃名教。”他的大胆议论虽然引起一些权贵、文人的不满，但也结交了不少主张改革的有识之士。同乡林则徐称他有经世之才，林昌彝赞扬他对国事有远见，江西黄爵滋等人则与之诗词唱和，成为挚友。



张际亮

时朝廷正纷纷议论鸦片问题，张际亮是极力主张严禁鸦片的重要一员。道光十三年（1833），他因林则徐的介绍，往见两广总督卢坤。广州自道光八年（1828）起，英国船只停泊在珠江口零丁洋之大屿山，专事贩卖鸦片。际亮在《上卢厚山官保书》中恳切希望卢坤能采取实际行动，营弁先拿“快蟹”，密缉密口，并向外商头目申明，不准英轮逗留经岁，否则予以驱逐。以后际亮复往北京，参加黄爵滋发起的禁烟活动。道光十八年（1838），黄向朝廷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就是由际亮代为起草的。

作为杰出的诗人，张际亮在仕宦无门，为生计所迫，浪游大半个中国的旅食生涯中，常闻“哀鸿遍野”，常见“饿殍载道”，因而写下了《石亭》《闻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处水灾甚剧感赋》《十五日夜宿弋阳筱簕岭述感》《自沂州至郯城夜宿郊外有感》《哀流民》等关心国家艰危、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表示了对人民苦难的怜悯与同情。如《哀流民》诗序：“癸未，东南诸省大水，楚灾大剧，其流民入吾闽者，日在百人，饥寒困顿，或死于道，所见若此，他可知也。为赋此诗，冀当道者闻而加悯焉。”诗云：“辛苦湖湘客，飘零异地春。鼃鼃骄岁月，鸡犬共风尘。道远思家失，年荒就食贫。东南半漂荡，何限此流民？”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同时，张际亮还“留心世务，蒿目疮痍”，在他的诗作中，也较多地反映了外敌入侵的危机，作了许多“纪宁波英夷之乱”的诗。面对鸦片严禁与弛禁、反抗外敌与屈膝投降的斗争，他写下了《浴日亭》《传闻》《迁延》《宁波哀》《后宁波哀》《定海哀》《镇海哀》《东阳县》《诸将》《陈忠愍公死事诗》等，揭露鞭笞侵略者与投降派的罪恶，歌颂坚持抵抗的爱国将领，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如《传闻》其二：

轻放徒矜战斗才，孤城仓猝亦堪哀。

翁山士马伤亡尽，支海夷獠笑舞来。

地险将军仍卧甲，天高使相但衔杯。

可怜碧血沉沟后，重见朱颜去不回。

此诗写道光二十年（1840）定海失陷事，是

揭露清朝统治者昏庸无能与投降派可耻面目及英国侵略者凶残罪行的一篇实录。定海失陷后，道光皇帝派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专办浙江军务。但他到任后，一面派人到英舰赔礼道歉，一面亲自宴请英国侵略军军官，奴颜婢膝，拜倒在敌人跟前。诗人对伊里布作了尖刻的讽刺：“地险将军仍卧甲，天高使相但衔杯。”前方的将士在卧甲枕戈，随时准备浴血奋战，抗击侵略者，而被任命为使相的伊里布却在宴会上狂饮寻欢，向侵略者殷勤献媚，这是何等的无耻！

又如《迁延》一诗中的“捷书互报中朝贺，犹诏仍蒙上赏颁”，揭露清廷将领奕经虚报战功以领取赏赐；“浪跋鲸鱼腥壁水，血分鸩鸟污珠鬢”，痛斥英国侵略军的横行霸道、奸淫掳掠。这些持作，或痛感国土的沦陷，或对诸将褒贬，都表现出一片反帝爱国的热忱，这在当时是具有强烈现实性的。鸦片战争中，张际亮曾同浙江人民一起流亡，备受苦难，这一时期的诗作特别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思想，感情真实，艺术成就也较高。际亮的挚友姚莹《张亨甫传》评他的诗“沉雄



姚莹



《思伯子堂诗文集》

悲壮”，颇能揭示出张际亮诗风之真谛。当代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颀则依据张际亮《与徐廉峰太史书》对乾隆以来各种诗派的批评，认为他在近代诗史上的作用，并不在于有多少艺术创新，而在于推动和代表了鸦片战争前后诗风的转变。

作为一位著名的闽籍诗人，张际亮与故乡福建和一水之隔的台湾有着不解之缘。他早年求学于福州，在福州籍著名经学家陈寿祺的指导下钻研经世之学，曾以岁试一等的成绩，肄业于闽都鳌峰书院。陈寿祺对际亮赞赏有加，认为其诗将来足以雄视天下。他在福州时一度穷极无聊，常往南台妓馆冶游，他同情妓女遭遇，曾写一部《南浦秋波录》，记载妓院生活。他在书中感慨地说：“自乾隆末，闽省大吏多贪黷货，幕府宾胥所得赃私，尽散诸妓。于是重楼邃宇，殆不减当年水晶宫焉。”对于贪官污吏之荒淫无耻，作了大胆的揭发。名士姚莹官福州时，际亮以诗见他，姚莹盛赞其诗，说他是前朝诗家李空同（李梦阳）、何大复（何景明）之流，二人遂结成生死之交。

道光二十一年（1841），姚莹为台湾道，正在抵抗入侵英军，函招际亮往台，共商战略部署。

际亮欣然应命，但到了厦门，因英舰在海上阻挠，不得渡而未果。姚莹在台屡创入侵英军，清政府传令嘉奖。此举为主和派大臣耆英所忌，乃片面据英人之词，上奏姚莹冒功，朝廷遂将姚莹解职，押解入都审问。际亮谒当道诸公，为姚鸣冤，并代姚作辩冤状上诉，百计营救，心力俱瘁，医药无效，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初五日逝世，年仅45岁。临终时，奉旨出狱的姚莹及朱琦等友人在床前读其生平所著诗数十册，由际亮决定取舍，后定名为《思伯子堂诗集》，以纪念伯兄资助其读书羁旅之功。

除姚莹外，同乡林则徐与际亮交情最厚。林则徐非常赏识际亮才干，曾将其父林宾日《饲鹤图》嘱他题诗。林在河南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任上，都与际亮频繁往来，并有诗词唱和。则徐进京委以禁烟重任时，际亮有“重臣报国心原瘁，圣主忧时事可争”的诗句；及至则徐发配新疆，际亮悲愤至极，曾作《传闻》诗寄意，中有“岂意孤军还撤援，竟言狡敌自飞来”句。际亮病亡时，林则徐正遣戍伊犁，闻际亮死讯，异常痛心，乃作诗哭之，诗云：“才素频从万里贻，吟成感事不胜悲。谁知绝塞开缄日，正是京门易箦时。狂态次公偏纵酒，鬼才长吉悔攻诗。修文定写平生志，犹诉苍苍塞漏卮。”

张际亮平生遗著除上述《思伯子堂诗集》《南浦秋波录》《金台残泪记》外，尚有《松寥山人集》《亨甫诗选》《惜山楼诗录》《建宁耆旧诗抄》《春巢集》《南来录》《豫粤游草》《委光堂稿》《匡庐游草》《谷海三编》等，辑为《张亨甫全集》。《清史列传》对张际亮有较公允的评价：“际亮负经济才，磊落有奇气。所为诗，天才奇逸，感时记事，沉郁雄宕，嘉庆、道光以来作者未能或之光。”确为不易之论。

残雪初融冻不流

——仓山书画人轶事

◇蔡 林

这是上世纪40年代，福州南台岛书画界最优秀的俊男才女，在杭州一线天景区前的合影。他们是著名闽画家蔡鹤汀、蔡鹤洲以及蔡鹤洲妻子林金秀、妹妹蔡鹤如和挚友陈永芝、合作伙伴邹锡沅先生。

要不是一位叶姓朋友的留言，询问我是否留意到蔡氏兄妹画家和她二姨妈陈永芝女士合作的画，这照片估计至今还留在《“汀洲”依稀荻芦梦——记画家蔡鹤汀、蔡鹤洲书斋“荻芦庵”》文件夹里，因为，在这群才俊里，我除了蔡氏家人

外，没有认出另外三人。《“汀洲”》一文完成后就没有再去探究。看到这段留言，脑海不知咋地浮现了出这幅照片。我急忙打开电脑，找到了这张照片，发了过去。“这就是我二姨”叶女士确认了照片中笑得最开心的永芝。

相信“冥冥之中”吗？许多事会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呈现出。不日阅到《2022年9月7日百岁老人白德懋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一文，获悉陈永芝即是白德懋的夫人，兴奋点被调动了起来。凭着感觉，我试着把目标锁定照片中间坐着的男子。照片发给邹海岳先生，老人家确认这是他的父亲邹锡沅，微信留言抑制不住激动的说：在哪里找到的？非常感谢！这是我父亲留在世上最好的照片。老人感慨父亲在解放初期被人陷害致死，家人销毁了所有的影像，至今没有找到像样的照片。我惭愧自己不够尽心，耽搁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1

照片上，一群南方时尚优雅的俊男美女，错落在“一线天”前嶙峋的岩石上。那年代似乎比现代更会构图，这类照片称“三三两两”，呈现出人景和谐的韵律美。背景“一线天”三个大字与崖壁佛造像带来的信息是杭州“飞来峰”景区。这一支南方巡展团队或在东晋咸和元年（326）飞来峰下佛教徒开建的“灵隐寺”里拜过如来大



右起蔡鹤汀、蔡鹤洲、林金秀、邹锡沅、蔡鹤如、陈永芝、持礼帽者

佛；欣赏过元代以来“灵隐”圣地飞来峰开凿的以佛教为题材的佛、菩萨、弟子、罗汉、高僧等造像。他们一定被誉为十世纪后中国石窟造像中心震撼了（仅飞来峰造像就有330余尊）在“一线天”和佛造像前留下了倩影。身后的“一线天”在飞来峰玉乳洞幽邃的洞中，入洞曲折百来步，一线天光由洞顶颺然而下，故称。

这一年他们是从南平出发。据海岳先生提供的一张拍于南平车站的照片，可见这群才俊的身影。永芝的服装和笑容酷似杭州一线天那张。海岳先生证实，南平车站照片中“除郑乃珖外，六人1946年赴上海办书画联展”。

经郑大陶先生辨认，南平车站照片中他父亲郑乃珖先生立在前排右2。学历史的郑大陶先生很严谨，他说，先父母1947年在南平结婚，没有听父亲说去杭州巡展。郑乃珖先生当年在南平，或因准备结婚，没有一同前往巡展，他去车站为好友送行。在留下珍贵照片的同时留下那段书画人友谊的历史。

蔡鹤汀之女徐瑶琴也证实了一线天合影“照片是在杭州，这年我妈妈24岁，她和永芝是好友。”陈永芝是邹锡沅太太的外甥女，对鹤汀的绘画天才极为崇拜，她在姨父的推荐下随蔡鹤汀学画。

照片上青春华少的陈永芝开怀地笑着，她生于1925年，天生丽质，性格委婉。在她心中这次出行，是一场很愉快的巡回，几个亦师亦友的小伙伴，以一技之长走天下。据蔡鹤洲年鉴，这次巡



前排右二郑乃珖、第二排右一陈永芝

展“由南平绕道江西、杭州举办展览，四五月间复到上海，并赴宁波、南京办展。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卫廷生、吴石等诸多国大代表参加了画展并买画。年底返榕”。如此算来，他们三、四月间在杭州。正是春寒料峭之时，从照片的场景和人物服装亦可感知。

蔡鹤汀的堂弟96岁的蔡南星（鹤汕）1946年高中毕业于格致中学，同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当年正在上海。“那年暑假，我们（蔡氏一家）和永芝在上海、南京时，都在一起”，在微信上和老人聊起永芝，还是记忆犹甚，满怀友情“她比我大3、4岁，思想进步，我在大学期间一直给她寄进步报刊”。蔡南星是同济大学的进步青年，参加过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运动，1948年遭到同济大学退学处分后加入浙南游击纵队。

从几方面的信息得到一个这行书画家巡展路线：（江西）杭州——上海——南京，“年底返榕”。近一年的辗转巡展鬻画，大家生活、学习、工作在一起。蔡鹤汀见永芝富有绘画天赋，倾力传授。永芝不负师恩，日进日新，鹤汀甚喜，常与永芝合作作画。由朋友搜来一张永芝与蔡鹤汀合作的作品，可见师生间的友情，落款时间丙戌年，正是在巡展期间的1946年。

热心成人之美的邹锡沅见状误会了师生之情，想从中成全他们。这个小插曲，得到南星老人的证实：“她（永芝）没有同意，家里更加反对，当时我和鹤如姐都了解”。陈永芝大姐的女儿唐女士也证实，她母亲常在家人面前提起这事。大姐性格火爆，敢于和姨父邹锡沅顶撞，她怕妹妹受委屈，将永芝介绍进了自己工作的福州美国新闻处，简称“美新处”做誊写工作，不再继续随蔡氏兄弟学画。

2

正当大姐想方设法让二妹走出姨父乱点鸳鸯的烦恼之时，白德懋出现了。“白德懋先生是我国现代住区规划的学科领头人”（百度百科），2022年9月百岁老人白德懋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

白德懋1923年出生于上海，少时在老家浙江镇海成长。1937年外出求学，5年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获建筑和土木工程硕士双学位。毕业后他到任福州“联合国”救济署，任技术室技师。联合国救济署创立于1943年，发起人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此“联合国”本质为福利机构，并非后来于旧金山组成的联合国组织。

白先生就职的福州联合国救济署在仓山乐群路23号法国领事馆。

陈家姐妹俩工作的“美新处”位于仓山民国中晚期美国驻福州领事馆旧址，也就是现在仓山区麦园路84号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白德懋时常因为英语翻译之事被请到“美新处”这边来，遇上了陈家姐妹。

白德懋迷上了美丽、温良、优雅的才女永芝。在大姐的撮合下，1947年10月白德懋回上海工作之时，陈家人为他们办理了订婚仪式，永芝随未婚夫离开了福州。次年春，白德懋在上海汇中饭店郑重迎娶了他的终身伴侣陈永芝。至此，中国多了一个相夫教子，为中国城市规划做出贡献白德懋的妻子，少了一位富有才华的女画家。

永芝母亲曾生下8个孩子，先后夭折，仅留下四个姐妹。永芝比大姐小两岁，早早和姐姐一起担起养家的重担。远嫁后随夫从上海到北京定居。白德懋体谅她对父母的念想，邀请双亲到北京游玩。大姐的女儿唐女士不无感慨地说，永芝写着一手好字，离了娘家随夫北上，曾短暂地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做过文员与林徽因共过事，之后潜心相夫教子。直至二十多年后三个孩子长大，才回福建连城探望随三妹单位搬迁到连城的父母。四姐妹们各有事业和家庭，思念多在书信往来中。改革开放后，她们几乎完成对家庭和社会的奉献，相约北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欢聚时光。如今大姐已是百岁老人了，她常聊起那段为二妹获得美满姻缘的经历。

2015年永芝走了，白德懋非常伤心。白德懋给大姐寄回一封很长的信倾诉失去永芝后的伤感。字里行间不忘感谢大姐这牵红线的人，带给了他这么好的妻子。他说一生不善哭，只为永芝

大哭了一场。爱妻永芝对家庭的付出和对他工作的支持铭记在心，“（我）工作期间，只顾埋头工作，家里的事完全由芝承担”。她带大了三个孩子，又带了孙子。“大孙子从出生到十岁都是她一手带大，是家族中最有成就的。”

永芝自从有了孩子后几乎没有参加社会工作，仅在文革期间到街道工厂工作过一段，更没有任何有关她的作品或绘画的信息。她守着丈夫做了家庭主妇。她的绘画天赋与照片上的笑容“残雪初融冻不流”地留在那代亲人和朋友的记忆里。蔡南星评价道：永芝如专志国画，有可能是大师级。或许连她那很有成就的丈夫白先生，也忙于事业忽视了身边的爱人。爱画画的永芝或在享受夫爱子孝的生活中，有意漠视了自己的艺术才华。但她总不忘师恩，通过在浙江任职的好友蔡南星（鹤汕）转述自己的生活，好让老师放心。婚后的“永芝在沪、京、港拍了不少照片，都托我转交鹤汀”鹤汕老人说。

1976年夏她终于踏上阔别30年的福州和姨妈表姐妹们团聚。这一年，她的恩师蔡鹤汀在三秦大地驾鹤西归。

2022年9月7日，百岁老人白德懋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国家给了他极高的荣誉，真诚感谢他为城市规划做出的贡献，永芝地下会有知的。那年杭州飞来峰“一线天”下，才貌双全的永芝快乐的身影隐藏着白德懋先生终身成就奖的荣誉奖牌里。

3

照片中前坐者邹锡沅先生是永芝的姨父，他是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与蔡氏兄妹关系甚密，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蔡氏一家居住在南台岛上藤路汇丰弄口边上的“郭厝里”，一大家子十来口人仅两间小屋和一个过道，拥挤不堪。邻居“邹厝里”是邹锡沅的一栋洋楼，他将楼里书房提供给蔡氏做书斋。早期仓山著名的蔡氏兄弟画室“荻芦庵”就设在邹的书斋里，慕名而来学艺、学画的人不少，弟子有福州连坂人黄子曦等人。直到40年代中后期，蔡氏兄弟才在信平路

“觉庐”里拥有了自己的“荻芦庵”画室。

邹锡沅年长蔡鹤汀5岁，清光绪二十年（1904）生于仓前山上藤路，早年家境贫寒，辗转就读于“三一”、“青年会”和“三山”等学校。高中毕业后，邹锡沅受聘到英商雀巢牛奶公司任职，同时与邻居，学布景广告刚出师的少年蔡鹤汀（14岁）、鹤洲（12岁）兄弟合办福州首家艺术广告公司，画招贴画，之后合作展鬻书画。

邹锡沅从临摹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入手，其后苦练汉、魏碑刻，自学书法艺术，打下坚实的基础继而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民国22年（1933），邹锡沅在福州《闽报》发表了正、草、篆、隶四幅中堂。《闽报》是日人在华办的第一份报纸，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刊，在福州、厦门、省内及北京、天津、上海、台北、台南、澳门、以及新加坡、吕宋等地均设有售报处。邹锡沅的书法随之流传海外，日本书法爱好者及东南亚华侨，慕名前来求取书法作品，名声大噪。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正值盛年，不仅书法四体皆精，而且兼擅国画金石，尤其榜书更风靡一时。邹锡沅三子海岳先生提供的资料表明，他父亲写的魏碑体，气酣墨畅、方劲挺拔，深受时人赏识。资料还记载当时福州繁华街道的大商店招牌多出自他的手笔，如“南星澡堂”“百龄百货”“大华鐘錶眼镜大商店”“南华服装大商行”等等。榜书招牌每字达三、四平尺，大的如福州“鸿记行”招牌每字七平尺，十分显眼。早年凡到台江大桥头、中亭街、台江路、上下杭一带繁华商业区走过、路过，商铺巨字迎面可见。生意人的招牌是独特的商业符号，讲究名家书写。当年，几个街区商业招牌多出自邹先生之手，可见对邹锡沅认可度很高。

邹、蔡以巡展方式扩大影响，同时近距离地接触到各地对中国传统绘画的需求。少年时期蔡氏兄弟画家就到上海南京等地不断在布景、广告到国画工笔、写意中调整进步。当年省内外巡展，掏银子买下他们作品的有福州籍从政者对福州小老乡的支持，亦有书画爱好者、收藏者的追捧，影响直达香港以及东南亚。解放后，蔡鹤汀的国



白德懋与陈永芝结婚照

画作品列入国家文物局首批“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首批精品限制出境名录”。

坐在照片当中永芝的姨父书法家邹锡沅，当年他发现永芝的绘画天赋，把永芝介绍给蔡氏兄弟学画，开启了她的艺术之灵；但是，他世俗地误读了师生之情，又亲手断送了永芝的艺术人生。永芝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如果没有如此的过节，家人也不会终止永芝求学，永芝平缓地在艺术道路上前行着，以她的才华终将达到自我实现的层面。人生没有如果，是祸是福，世事难料。永芝以自我牺牲的形式让父母姐妹放心，让丈夫子女幸福，这也是一种伟大。

邹锡沅更是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解放后因族人诬告于1951年6月在镇反运动中被错杀，时年48岁。波及的家人离开“邹厝里”四处流离，不敢留下包括邹锡沅肖像在内的太多痕迹。那些风靡台江十里洋场的书法广告，连夜被人铲除，无任何残留。1986年9月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了落实平反。1992年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代表他的书法艺术的《邹锡沅书法》专集，2012年列入梁桂元先生主编的《翰墨留韵——榕台历代名人书画选》，令家人欣慰。

1946年初春，福州南台书画才俊在残雪初融的杭州“一线天”下留下了美好。永芝沁人心扉的笑靥，在数十年后，依然能读到她当年的快乐。《邹锡沅书法》第42页登载了他用篆书书写的小诗：“断桥小路过如油，残雪初融冻不流。记取杭州江口驿，天寒齐上酒家楼。”

槟城辜氏兄弟的福州行迹

◇ 孙源智

风人爱多风，当风胸辄爽。不竞笑南方，归舟凌浩莽。

南风送我还，北风迎我往。顷刻驾长风，已出南荒壤。

这首诗题名《仲冬望后连日舟行海中遇风》，为清末民国时期南洋诗坛领袖邱菽园在北返中国的途中所作。诗中反复题着一个“风”字，诗人因即将返乡而欣喜若狂的感情，也如海风一般奔涌而出。邱菽园出生于漳州府海澄县，八岁时随父亲到新加坡定居。在他的心中，这个已发展成远东地区商业中心的都市，相对于家乡只是“南荒壤”罢了。

邱菽园是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华人移民大潮中来到南洋的。早在他来到南洋的两个世纪前，福建人下南洋的历史就已经开始。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是马来半岛上最大的三个华人聚居的城市。这些早期华人移民在这些地方逐渐扎根，繁衍生息。他们的后代称像邱菽园这样新来的移民为“新客”，俨然自己已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但这些新主人对于当地的马来人而言，终究是外来者。他们被称为“峇峇”，也就是土生华人。

这个远离故土的华人群体出生在南洋，受着西方教育，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中国传统仪式，

又让他们始终难忘故土的方向。他们对于中国抱着更加复杂的情感。中国对于他们而言太过遥远，太过陌生，但这又勾起他们更为迫切的想念。名闻中西方的近代奇人辜鸿铭，便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峇峇。

辜鸿铭出身于槟城最古老的华人家族。他的曾祖父辜礼欢是槟城最早的华人领袖。早在18世纪，辜礼欢就率领华人来到这里定居，并被英国总督莱特委任为槟城第一任甲必丹。在南洋的华人中，有着“三代成峇”的说法。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在英国人布朗的橡胶园中任司理，周围的人都喜欢称他为“峇云”。峇峇的称呼，也是辜家在槟城落地生根的标志。

异乡变成了故乡，故乡却成了异乡。到了辜鸿铭出生时，这个从福建漂泊来的家族已经在槟城立足了百年之久。一百年的时间已经足够遥远，足以抹淡这个家族对于故乡的记忆。直至今日，关于辜氏家族的祖籍地到底在闽南的什么地方，依然充满了争议。

辜鸿铭于1857年（一说1856年）生于槟城，是辜紫云的二儿子。他自小在槟城接受英式教育，到了十余岁时随布朗到欧洲留学。直至1879年，二十三岁的辜鸿铭才学成归来。经过在槟城短暂停留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再度踏上归程，去寻找他那失落已久的故土，一倾积愆。他的心情想必比邱菽园还要更加迫切。如果说邱菽园心中

寄托着的是他少年离乡的游子乡愁，那么辜鸿铭的这份乡愁已经郁积了百年之久。

辜鸿铭选择福州作为他与故土初识的地方。此时，他的兄长——也是他唯一在世的亲人辜鸿德，已经在福州经营了十五年之久。

二

福州在文人笔下有“三山”的雅称，似乎三座山就足以概括福州的千年格韵。三山之中的乌石山，很可能是辜鸿铭对福州记忆最深刻的地方。

乌石山的故事恬谧而悠长。乌山东侧的贞元无垢净光塔碑，是福建省现存最古老的一方碑刻，自中唐起便在此伫听历代文士墨客吟思咏怀。宋代大儒朱熹曾避居于此，在山麓石室中讲学，至今山石上尚遗有他的“清隐”题刻。宋末的游汶、元末的吴海、明末的孙学稼，均曾居此不应征辟，持志葆真。清代文人张际昌在目睹乌山的幽奇后，更是集唐人诗咏出了“涉趣皆流目，到来生隐心”的佳句。但让辜鸿铭记住这里的，并不是这些山林之趣，而是清末一声历史的浩叹。

1878年，这里爆发了震惊一时的乌石山教案。当时，英国传教士擅自在乌石山筑室传教，与福州绅民产生矛盾，最终酿成绅民焚毁英国神学书院的冲突。次年，此案在时任福建巡抚的晚清名宦丁日昌主持下，以判处涉事官绅士民，严令英人远徙城外了结。但英人及教民在审理过程中仗恃武力、咄咄逼人的形象，依然给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辜鸿铭来到福州时，乌石山教案已经接近了尾声。这场发生在中英之间的冲突，让这位看起来更像是一位英国绅士的华人感到无比的震惊。从一踏上福州这片土地开始，辜鸿铭身为中国人的意识就开始觉醒，这次冲突更是刺激了他对自身文化归属的反思。最后，这位精通英文却不会说中国官话的华人以“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署名，发表了一首英文诗以宣泄他的愤怒。在诗中，他痛斥英国传教士不符合基督徒身份的种种作为，

呼吁统治者“像龙卷风清扫尘土一样”将传教士驱逐出去。对辜鸿铭自己来说，要被驱逐的还有他英国人的身份。

不久后，辜鸿铭离开福州回到南洋，在马建忠的影响下开始研读中国古籍，并蓄起了那条后来举世闻名的辫子。辜鸿铭曾几次回到福州，但再未留下太多记载。不过在福州经历的乌石山教案在他内心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直到十多年后，身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还再次以“一个中国人”署名，写了长篇的英文论述，就当时中国各地教案纷起的情况，斥责传教士的伪善，为中国的反洋教运动展开积极辩护。

清朝灭亡后，辜鸿铭就像曾在乌山隐居的游汶、吴海、孙学稼一样，以遗民自居。他不断用英文向西方世界发声，宣讲《春秋大义》，高倡中学优于西学，宣扬儒学救世论。他视自己为“老大中华末了的一个代表”，至死不肯去辫，认为对清室的效忠也是在“效忠于中华民族文明事业”。

在辜鸿铭的身后，各式各样的传说模糊他原本的真实形象，他渐渐成为了近代中国对传统文化固执坚守的一个符号。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着他特立独行的奇闻异事，不遗余力地渲染辜鸿铭对于祖国的热爱。



乌石山黎公岩

三

乌石山东侧的八一七北路，古称南街，是福州城历史上传统的中轴线。随着福州城市的发展，这条中轴线不断地向南沿伸，近代时其南端已经到了南台岛北侧的烟台山。福州开埠后，这里先后出现了百余家洋行，与江对岸闽商活跃的上下杭地区相互响应，南台江来往商船穿梭如织，成为了晚清时期的福州贸易中心。清人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南台距省十五里，华夷杂沓，商贾辐辏，最为闽省繁富之地。”辜鸿铭的兄长辜鸿德，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二十年。

辜鸿德于1843年在槟城出生，比弟弟辜鸿铭年长了十四岁。中国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兄弟年龄的悬殊让辜鸿德肩上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他十多岁时就在布朗的船代公司中做学徒。随着见闻的增长，辜鸿德对未来也有了更深远的思考。由于新加坡的崛起，槟城作为远东贸易自由港的地位已经在不断下滑。辜鸿德想要寻求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红茶贸易港口——福州。1864年前后，辜鸿德在下南洋的风潮中选择回到中国，在福州创立怡兴洋行。

清政府对于辜鸿德这样的英籍华人，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好感。这些天朝的海外弃民虽然对中华文明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但对清政府却没有天生的忠诚。不仅如此，打着“反清复明”口号的秘密会社，也在南洋华人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辜鸿德的曾祖父辜礼欢当初就是义兴会的领袖，而咸丰年间爆发的小刀会起义就与这一组织有关。这样的原因，更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对海外华人这一群体的不信任。

但英国人的身份还是让辜鸿德得到了很多好处。晚清吏治腐败，苛捐杂税繁多，厘捐是当时最主要的商业税。地方官吏为谋取私利，在课征中随意设卡，“厘金任意浮开，以多报少”的情况屡见不鲜，大大加重了商人的负担。外国商人并不需要交纳这项苛税，辜鸿德作为英籍华人自

然也享有这样的待遇。这种“特权”让地方官员十分不满，他们曾以“抗纳厘金”为名对怡兴洋行进行指控。

不过，最终让辜鸿德命运发生改变的是一场关于服饰问题的争论。1878年6月，福州地方官员以辜洪德“未肯弃置中国服色”为由，拒绝辜洪德依英商章程进行租地程序。地方官员要求辜鸿德必须改为西方着装，否则就不能享受英人的待遇。这一改装的要求遭到了辜鸿德激烈的反对。在辜鸿德的内心深处，他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放弃中国服饰对他来说相当于放弃了华人的身份。辜鸿德甚至指出，如果清政府坚持改装的规定，那么英籍华人应当被允许像太平天国一样穿着明代服饰。

辜鸿德轻率的言论显然触犯了清廷的忌讳，清政府开始拒绝他的贸易请求。约在1882年，辜鸿德被迫放弃了他多年来在福州建立的一切基业，将怡兴洋行迁至香港，离开了这个居住了将近二十年的地方。

四

辜鸿德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当时的南洋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寺院，人们大多只是遵守着历来的传统，烧香拜佛，希冀神灵的保佑。在辜鸿德来到福州后，那些历经千载的名山古刹让他深受感染。他与福州的许多高僧结交，为福州寺院的重建积极奔



西禅寺

走，成为了早期沟通福建佛教界与南洋华人社会的关键人物。至今在涌泉寺与西禅寺的大雄宝殿上，还铭刻着辜鸿德的名字。

鼓山涌泉寺始创于唐，素有“八闽首刹”之称，在福州流传有许多关于涌泉寺开山方丈神晏国师的传说。同时，这里也是福州的一处人文胜地，山上留存有三百多处摩崖石刻，是福建古代石刻最多且最集中之处。如今，辜鸿德也成为这人文胜地的一部分，在鼓山涌泉寺大雄宝殿外的一对石柱上，有一副落款“槟榔屿信士辜洪德”的对联。这副对联刻于1882年，也就是鼓山大雄宝殿重建的时间。显然，辜鸿德参与了鼓山大殿的修建，并且是当时主要的出资者之一。

相比于鼓山，辜鸿德与西禅寺的缘分似乎更深一些。这座古称怡山的寺院对怡兴洋行的主人来说，或许也象征了一个好彩头。辜鸿德的名字不仅出现在西禅寺大雄宝殿一个醒目的位置，并且在祖堂外的两块功德碑上更是以“引进渡洋助募槟榔、磷朗等处缘金，回寺完成大殿董事”的身份名列募首。功德碑上记载了清光绪年间，西禅寺从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中国的厦门等地募集的五六百笔捐款。其中，不少捐赠人在南洋华人社会中有着显赫的身份，反映了辜鸿德当时在南洋社会中的影响力。

正是在辜鸿德的推动下，福建与南洋佛教界展开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频繁交往。一方面，如西禅寺微妙法师、涌泉寺妙莲法师的福建僧人南下，促成了南洋汉传佛教的兴起，加强了南洋民众与祖地的经济、文化及信仰交流。另一方面，不断从南洋汇回的资金对福建寺院大规模重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奠定了近代以来福州五大丛林的格局。

参与涌泉寺与西禅寺的修建，已经是辜鸿德在福州最后几年发生的事情。面对不得不离开的福州，已入不惑之年的辜鸿德仿佛又一次要背井离乡了。大多数参与两寺捐建的外籍华侨在留下名字时，往往会标明自己的祖籍地。但辜鸿德在两处落款中都只署“槟榔屿弟子”“槟榔屿

信士”。

在辜鸿德离开福州的多年以后，清廷逐渐意识到南洋华人对中国强烈的归属感，保护海外华民政政策开始转趋积极。到了清王朝灭亡的前夕，另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闽籍华侨刘金榜衣锦归乡，参与捐建西禅寺内山门和涌泉寺天王殿。他自豪地在每处落款中都署下清廷授予的“赏戴花翎钦加二品衔候选道”官职，将二十年前曾到此的“槟榔屿信士”衬托得更加落寞。

五

辜鸿德离开福州后，将商号改为“怡兴”，去掉了他并不喜欢的“洋行”称呼。1886年，他被任命为香港太平绅士，是香港早期受封此衔的华人之一。到了晚年，他对海南岛情有独衷，这座小岛温热的气候或许让他想起了他的出生地槟城。

1898年，辜鸿德夫妇与英国领事巴特勒、法国领事加恩等人在海口聚会，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中，在一群欧式服装的外国人中间，辜鸿德与夫人依旧一身中国传统服束，这份坚持让人不禁联想到辜鸿铭对辫子的执着。众人背后的立屏上抄录着一副对联：“宽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这是清代大学士张廷玉极具中国传统处世智慧的一则遗训。辜鸿德与辜鸿铭分别为儿子起名为守谦、守庸，同样也是这种智慧的彰显。

1910年，年近七十的辜鸿德在海口去世。两年后，清政府被推翻，曾受辜鸿德资助的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8年，以清王朝遗民自居的辜鸿铭在北京病逝。在辜鸿铭过世的前一年，另一位著名的遗老——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拖着一条长辫在北京颐和园投湖自尽。

不管是支持革命的辜鸿德，还是效忠清室的辜鸿铭，他们对中国服色的坚守是同样倔强的。那条受人嘲笑的辫子对于曾漂泊异域的他们而言，是将他们与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最重要的象征。辜鸿德、辜鸿铭都没有归葬槟城的祖坟，他们分别下葬在去世的地方，将灵魂与尸骨永远留在这片他们深爱的故土。